

工资形成机制变革下的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

一契机、路径与政策

杨瑞龙 杨继东 阎衍 朱戎

内容摘要：2010年，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工资不降反升，且增速超过城市工人工资的涨幅；（2）伴随经济的触底反弹，中国经济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反弹，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快速被“民工荒”所替代，低端劳动力的供给已经由总量过剩转向结构性过剩；（3）各种民营和外资企业大幅度提高招工工资，各级政府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4）“劳资关系”冲突进一步加剧，工资集体协商和罢工事件开始频繁发生。

这些现象的涌现不仅说明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宣告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正从传统的“生存工资定价法则”转向“保留工资约束下的市场议价法则”转变。这种低端劳动力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具有深刻的内涵。因为它将进一步带动中高端劳动力市场的劳资关系和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中高端劳动力市场政府导向型的工资调整机制。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必将使中国工资形成机制迎来全面市场化的新时期。

这种由低端劳动力市场开启的全局性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在未来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工业化以及制度改革的作用下，必定引起工资的补偿性上涨、保留工资的提高以及工资与劳动生产效率的同步提高。这些因素必将决定中国在未来5年左右面临持续的加速性的市场化工资，中国将在中期阶段面临工资水平较快增长的新时期。

未来工资的较快上涨必将给部分地区、部分产业以及整体宏观经济的稳定带来冲击。但是，在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效率持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以及中国贸易依存度偏高等条件下，未来持续加速的工资上涨不会影响我国制造业的总体竞争优势，也不会近期转化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有损于改变目前存在的各种深层次结构性困境。中国低端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必将成为引领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支点，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新的契机，开启中国市场驱动型经济结构调整的新阶段：

（1）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从根本上改变劳资关系，改变工资上涨严重滞后于国民收入上涨的局面，使中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而启动中国市场化的收入倍增变化，改变中国收入分配不公，提高国民的整体消费率，加速中国“收入-消费升级”的台阶效应的到来。

（2）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的上涨将对不同区域的生产成本带来不同的影响，从而使各种传统产业在区域成本差异的推动下，向中西部加速进行“梯度转移”，使东部流出产业升

级的空间，同时克服以往行政化产业转移带来的各种问题。中国必将在迎来在“加速性梯度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的新时期。

(3) 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各种要素价格之比，使市场主体自发进行要素替代，采取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促使企业提高自主研发和技术进步水平，积极探索新的盈利模式，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以往行政性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的弊端，开启市场化创新的新时期。

因此，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第一，劳资关系将发生深刻变化，带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为中国迎来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拐点性转变提供了新契机，为缩小收入分配差异过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的加速转变。第二，区域结构的变化，将带动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新格局的形成。第三，要素价格比的变动将促使产业结构自动升级，中国将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提前启动制造业的高加工度化，进一步强化未来国际分工的大国地位。第四，城镇化建设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动和工资水平的加速上涨将使中国迎来城市化的超加速期。第五，工资增长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本政策的实施，将使中国步入人力资本投资的加速时期，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将使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人力资本偏向型发展期。

鉴于上述的判断，本报告认为，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低端劳动力市场供求拐点式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种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机制变革的战略意义，应当看到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不仅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开启中国全面市场型结构转型的支点。

第一，要从战略发展的高度，把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与要素价格市场化作为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通过价格机制的杠杆作用撬动整个经济结构的重塑。从而将以往单纯的行政转型思路转变到以市场导向的经济结构转变上来，使市场主体自发地、全面地、稳定地进行分配机制的调整、产业的升级、区位的选择和创新的强化。

第二，要积极推动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引导和规范低端劳动力市场“市场协议”工资形成机制的培育。逐步完善工会制度，加强劳资纠纷的立法，重视农民工的培训。同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以应对工资水平的上涨带来的负面冲击。

第三，在农民工工资水平大幅度上涨和农民工工资市场议价机制形成之后，政府应当引导该机制变革对于中高端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积极培育市场化工资形成机制，有意向地调整传统的劳资关系，加强初次分配改革中的各项制度建设。

第四，在产业加速梯度转移的进程中，政府一方面要顺应市场化转移的潮流，加强中西部产业转移承接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必须出台政策应对东部在传统产业转出后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必须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使东部进行全面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以形成东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产业基础。

第五、在劳动力结构和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期，人力资本战略和人才战略的实施具有高度的经济战略意义。政府应当从传统的物资资本投资模式转向人力资本投资模式之上。

第一部分 生存工资法则向市场议价型工资法则转变

一、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变化，由总量过剩向结构性过剩转变，它宣告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工资水平的上升成为趋势性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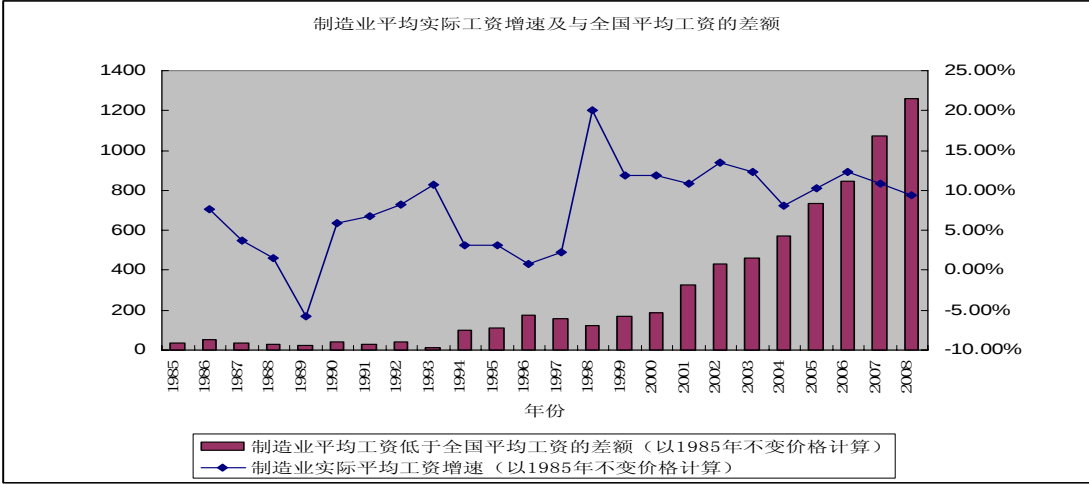
2010年，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工资不降反升，且增速超过城市工人工资的涨幅；（2）伴随经济的触底反弹，中国经济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反弹，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快速被“民工荒”所替代，低端劳动力的供给已经由总量过剩转向结构性过剩；（3）各种民营和外资企业大幅度提高招工工资，各级政府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4）“劳资关系”冲突进一步加剧，罢工事件开始频繁发生。

这些现象的涌现不仅说明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宣告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正从传统的“生存工资定价法则”转向“保留工资约束下的市场议价法则”转变。这种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进一步带动中高端劳动力市场的劳资关系和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中高端劳动力市场政府导向型的工资调整机制。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必将成为中国劳动力工资形成机制全面变革的支点。

1、即使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工资仍然不降反升，持续上涨。

自2004年“民工荒”暴发后，农民工工资结束了长期的停滞状态，进入了一个快速的上升通道。迄今农民工工资延续了6年的上涨态势，涨幅超过1倍，年均涨幅超过12.4%，至今也没有平息下来的迹象，甚至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一个典型事实就是，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2009年农民工工资不降反升，幅度不下10%。在农民工屡受歧视的二元就业制度下，农民工工资的涨幅居然反超城镇劳动力，仅2001-2005年反超幅度就达到64%。（参见分报告）。图1描绘了1985年以来制造业实际平均工资增速。2000年后，制造业实际平均工资增速在10%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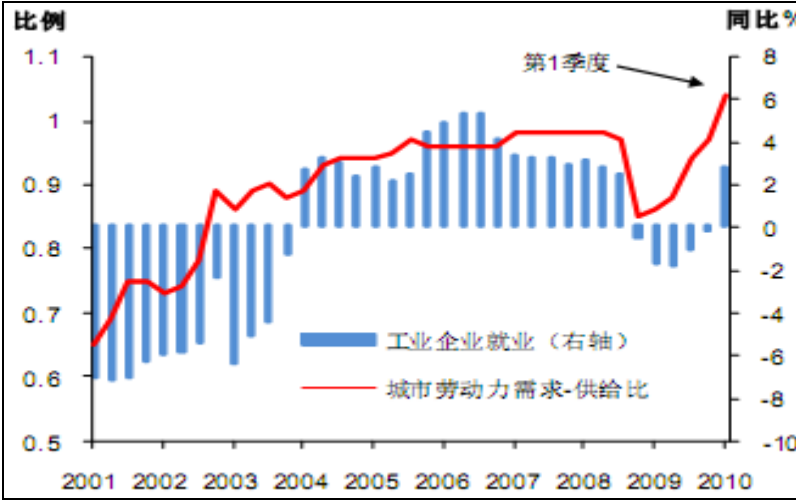
图 1 制造业平均工资实际增长速度



2、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出现大幅度逆转，局部出现“民工荒”

全部在岗职工人数今年 3 月同比增长了 3.5%，工业企业就业量 1-3 月增长了 2.9%，而城市劳动力需求供给比达到 103%，超过正常繁荣时期 95% 的平均水平。同时，沿海和内陆局部区域同时出现了“民工荒”（参见图 2）。

图 2 城市就业状况



从地区情况看，在 2010 年中国东部、西部、中部各个区域的劳动力需求-供给比都超过 0.95，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另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 年度，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人数下降 8.9%。特别是珠三角地区，2009 年该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较 2008 年减少 22.5%。

3、我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显著变化，低端劳动力增长幅度放缓，低端劳动力供给水平下降。按照联合国的预测，中国将于 2010 年劳动力占人口的比重见顶回落，同时其总抚养比也将见底上涨。从我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来看，尽管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占比仍然很高，但最近几年，劳动力增速明显放缓（见图 3）。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10 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达到历史低点。随后，总抚养比

开始增长，劳动力比重开始下降（见图 4）。

图 3 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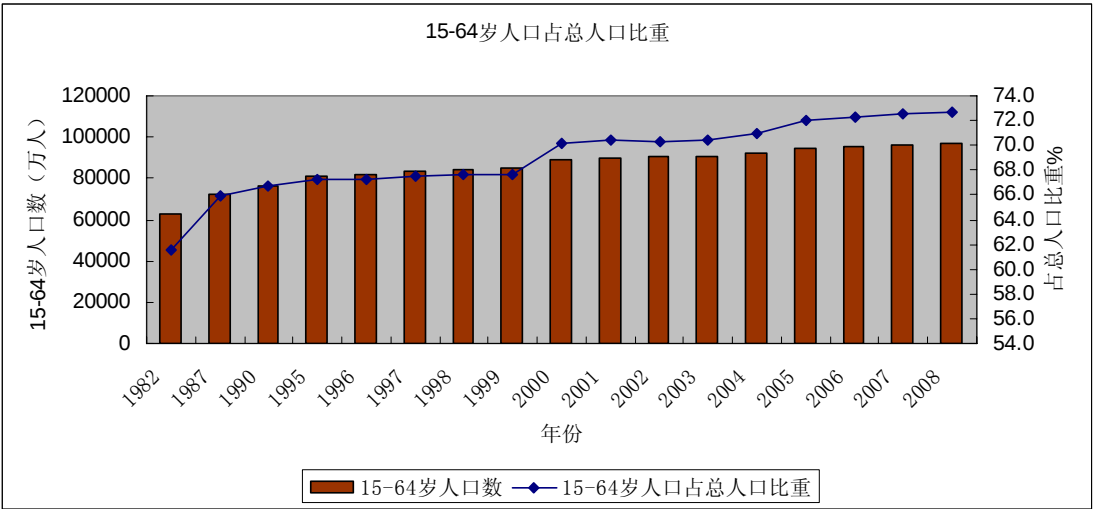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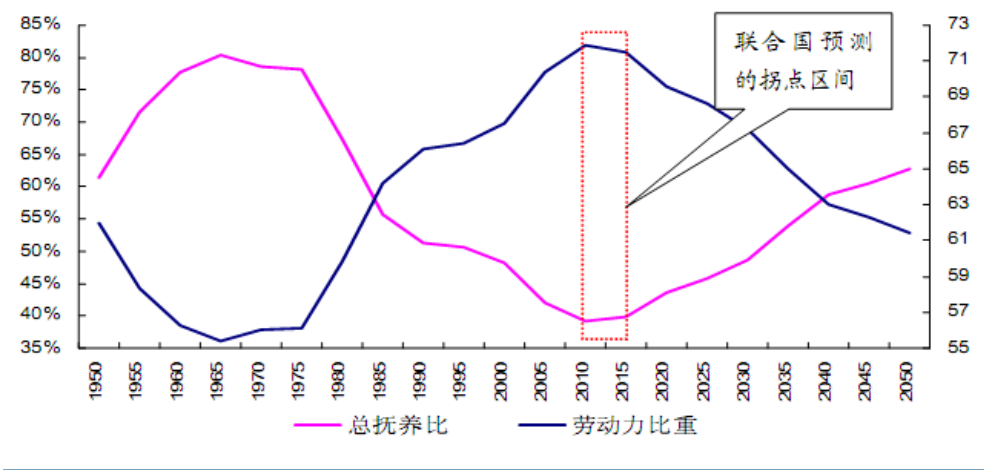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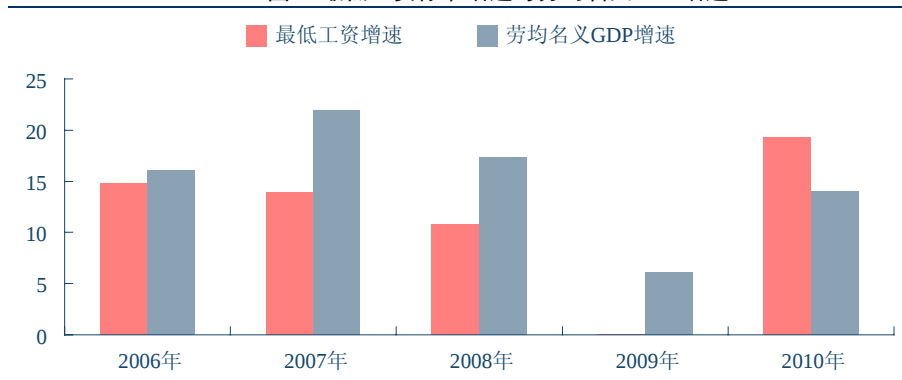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人口结构



4、“劳资关系”冲突进一步加剧。各种民营和外资企业大幅度提高招工工资，各级政府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其集中体现在：（1）由“富士康事件”引发的南北罢工事件；（2）20 多个地方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增速接近 20%，首次超过年度劳均名义 GDP 增速；（3）以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为龙头对农民工加薪，增速达到 40%左右，打破了以往“工资增长慢”、“工资增长以国有单位为风向标”局面。

图 5 最低工资标准增速与劳均名义 GDP 增速



东部各种劳资关系的恶化也使大量资本向中西部转移，以谋求要素套利和制度套利。例如 2009 年外资流入的区域分布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同时，很多行业的代表性企业也纷纷向内陆布局（参见图 6 和表 1）

图 6 2009 年外资流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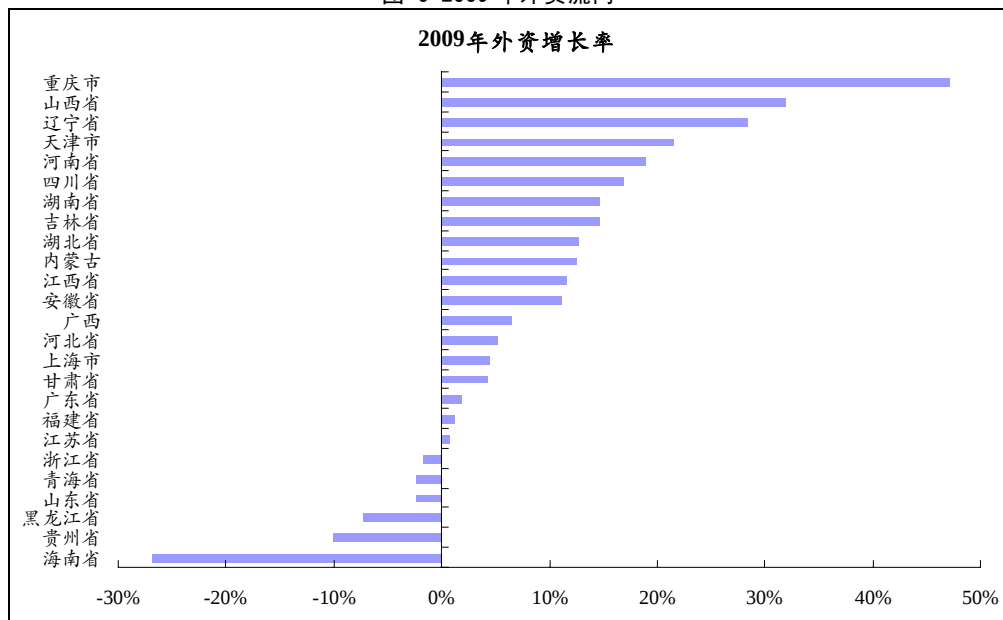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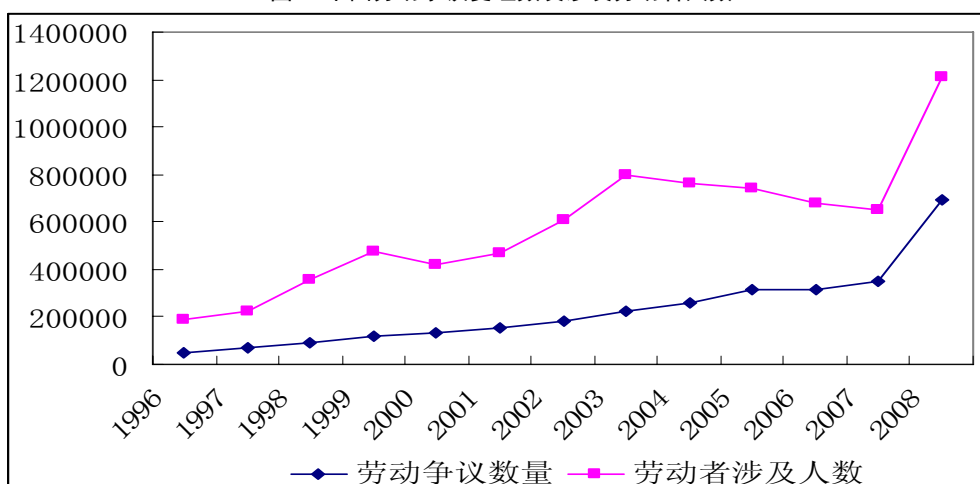


表 1 多个行业的代表性企业纷纷布局内陆

企业	城市	金额/产能	时间
富士康	成都	10亿美元	2009
	重庆（富士康（重庆）信息科技产业基地）	10亿美元	2009
	重庆（商业地产投资）	100亿元人民币（计划）	2009
中洲国际	安徽（安庆制衣工厂）	1亿元人民币	2008
	重庆（计划投资建厂）	计划中	2010.4
TCL	成都（西部地区液晶模组整机生产基地）	液晶模组整机一体化200万台产能	2009
	西安（TCL集团工业研究院西安研发中心）	计划中	2010.4
美的	合肥（美的冰洗产业工业园）	11亿元人民币	2007—2010
	邯郸（美的邯郸工业园）	5亿元人民币	2010
	重庆（重庆美的工业园）	10亿元人民币	
格力	重庆（格力重庆工业园）	6亿元人民币	2001—2007
	重庆（格力重庆工业园，拟扩建）	计划扩大产能	2009.12
	合肥（格力电器合肥产业基地）	15亿元人民币	2007—2008
海尔	重庆（家电生产基地）	28亿元人民币	2007
惠普	重庆(惠普全球软件服务中心(中国)重庆分中心)		2005.1
	重庆(惠普全球测试服务中心)		2008.6
	重庆（惠普（重庆）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	估计投资约20亿美元；预计年产400万台	2009.8
	重庆（惠普（重庆）生产出口采购公司及结算有限公司）	0.6亿美元	2009.12
英特尔	关闭上海工厂，扩建成都生产基地，研发基地留在上海	6亿美元	2004 - 2010

劳资纠纷问题最显著的特征是纠纷的数量和涉及的人数都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根据《劳动统计年鉴》，1996 年我国相关部分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为 48121 件，涉及劳动者人数为 189120 人；2008 年相关部分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达到 693465 件，涉及劳动者人数为 1214328 人，案件数量和人数分别为 1996 年的 14.4 倍和 6.4 倍。下图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劳动争议案件的变化情况。

图 7 中国劳动争议受理数及涉及劳动者人数



二、工资水平的上涨是由人口因素、周期因素、政策因素、结构因素等多因素导致的,其反映的是在保留工资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共同推动下,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正在从传统的生存工资法则转向保留工资约束下的市场议价型工资法则,并将使中国经济迎来工资快速上涨的新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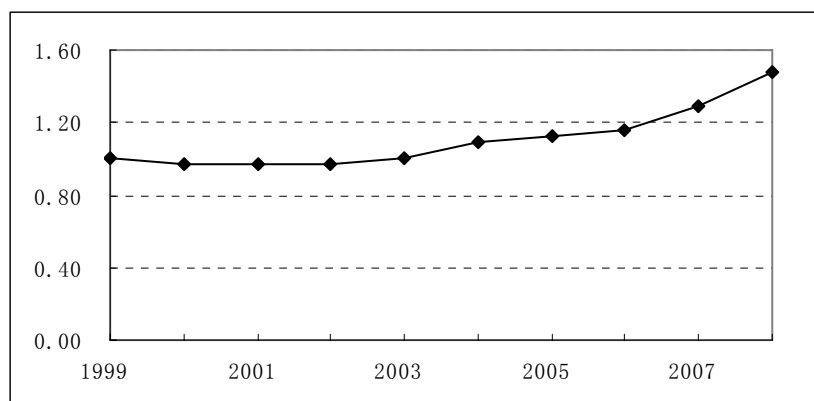
1、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保留工资不断上涨,推动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

保留工资的上涨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农村改革使务农收入进入一个稳健的上升通道。在“两级所有、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下,中国农民并不像刘易斯描述的雇农,而是更接近于自耕农,拥有农业剩余。务农收入就等于家庭内部的人均农业产出。由于存在剩余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低,随着劳动力转移,人均产出将增加。过去政府通过农业税、各种统筹提留、压低粮食价格等手段将人均产出增加的好处剥离出农户,压制了务农收入的增长。但现在,随着农业税豁免、清除统筹提留、粮食补贴、粮食收购价保护政策等,人均产出增加的好处留给了农户,人均产出的增加真正演变为务农收入的增加。可以预料,出于改善城乡结构的考虑,我国仍会进一步强化农村制度创新以及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务农收入的增长态势仍然会继续。

第二,受制于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资源价格不断上涨,它将带动城市生活成本、交通费用的增长,并对转移成本构成上行压力。调查发现,农民外出务工的最主要三项开销是食品支出、衣着支出、交通通讯支出,特别是食品支出,占总开销的 2/3 以上。食品支出的变动情况对城市生活成本影响很大。

从图 8 可以看出,近年来城市食品价格的上涨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仅 2003-2008 年短短 5 年时间内,食品价格累计上涨了 48%,年均涨幅接近 10%。这会在相当程度上抬高城市生活成本及生存工资。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不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改善,粮食供求紧平衡局面还会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再加上国家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的作用,农产品价格将进入持续的上升通道,它会继续推动食品价格上涨,并与其他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上涨一起构成助推转移成本增加的重要力量。

图 8 城市食品价格指数的演进趋势



2、留守劳动力的家庭分工型特征使劳动供给曲线变得缺乏弹性。尽管农村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劳动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

中国目前农业劳动力人数仍高达 3 亿，其就业比重达到 40%，可以说，农业部门仍滞留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对于这一点的一个最直观的验证就是，近年来随农业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农业产出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连年增产，仅 2003-2008 年粮食产量就从 4.3 亿吨一路增至 5.3 亿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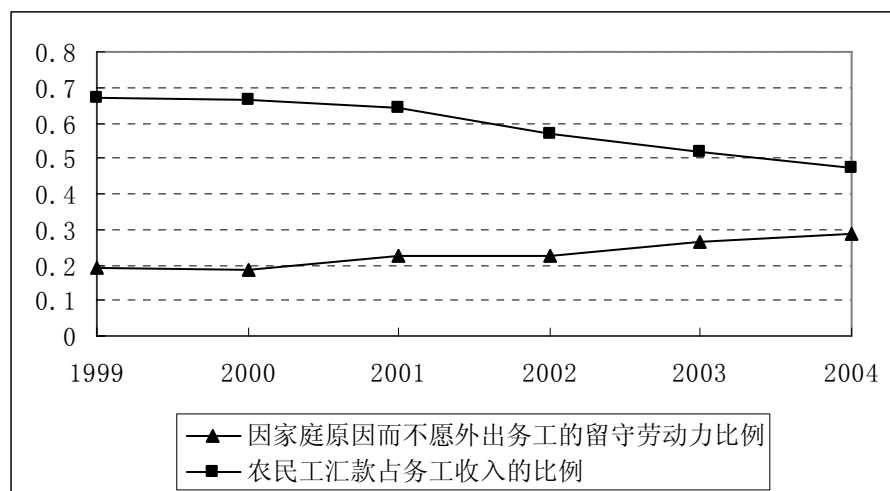
但也要注意，即便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也不代表劳动供给就像传统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具有无限弹性。这与农村劳动力的家庭分工决策有关。传统理论假设，由于农业收入极低，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工业部门务工的机会成本近乎为零，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趋之若鹜地涌向工业部门，这是造成劳动供给曲线无限弹性的根本原因。但在今天的中国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正在不断上升，并不像传统理论假设的那样忽略不计，特别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务工地与家庭生活地点的空间分离使他们难以兼顾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家庭效用损失愈发明显。

按贝克尔的家庭劳动分工理论，一个人的劳动供给决策不仅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收益与成本比较，更重要地，还要取决于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需要。即使他参加工作能够赚取工资，如果家庭需要他留下来分担内部劳动，他也可能会放弃这样的机会，除非工资足以弥补他放弃内部劳动所带来的效用损失。对中国农村来说，可能正面临着这一现实。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留守劳动力比较多，将劳动提供给工业部门不会对家庭内部劳动产生明显影响，但随着劳动力的持续转移，留守劳动力越来越少，照顾老人、子女、房屋等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日益迫切。留守劳动力虽然闲散，但在承担家庭劳动分工方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载体。离开这种分工，家庭生活质量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子女无人管教、老人缺乏呵护、房前屋后荒芜、财产面临失窃危险等等，都是这种影响的典型表现。

贝克尔认为妇女是典型的家庭分工型劳动力，现在我国农村留守劳动力正是

以妇女为主要群体的，这验证了贝克尔的推断。目前全国有 2.5 亿个农户家庭，3 亿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算下来每户只有 1.2 个留守劳动力，如果要继续转移，很多农户都将面临没有劳动力留守的情形，家庭分工对留守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将构成掣肘。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判断，我们利用内蒙、甘肃两省 1500 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1999 年在农村留守劳动力中只有 19.3% 的劳动力表示因家庭原因而不愿外出务工，但到了 2004 年这一比例升至 28.9%，增加了近 10 个百分点。这还只是 2004 年的情况，现在比例应该更高。

图 9 留守劳动力劳动供给意愿的变化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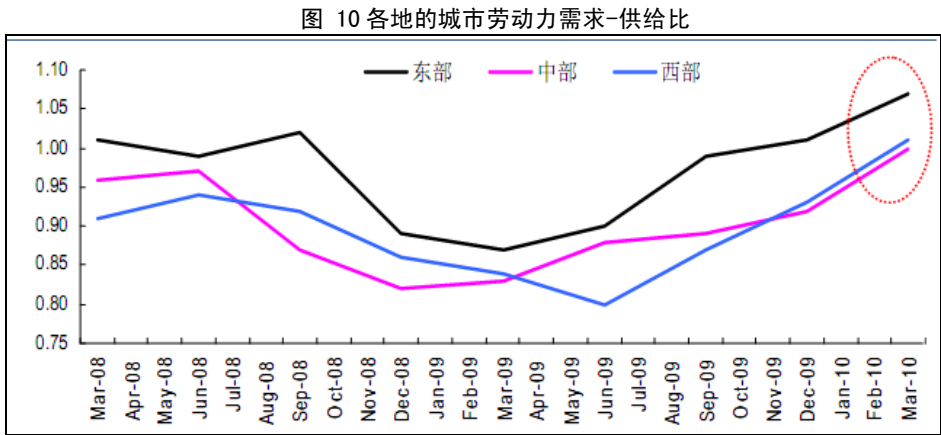
当然，家庭分工的掣肘作用要真正发挥出来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农民摆脱了对务工收入的饥渴式依赖，只有这样，当家庭需要他留下来时，才有勇气拒绝工业部门的就业机会。近年来随着农村制度创新，农业收入有很大的提高，农村生活也在不断地改善，农村的推力正在弱化。所以上述前提正在逐步具备。就拿近 10 年的变化来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 1999 年的 2210 元增加到 2008 年的 4761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实际增长率为 68%。如果按每户 3.2 个人口计算，现在农户家庭的年均收入达到 1.5 万元，这至少能说明，农户家庭正在摆脱以前的赤贫状态，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相应地，对务工收入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陷入不计成本的、饥渴式的依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家庭年轻子女外出务工，父母甚至不需要他们将务工收入寄回来。从图 9 可以看出来，1999-2004 年农民工汇款比例不断下降，1999 年农民工将 2/3 的务工收入都汇回家，2004 年降为 47.3%。家庭经济实力的增强，为留守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决策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家庭分工也更容易发挥实质性影响。

上述变化将带来一个重大影响，那就是对农民来说劳动供给不再是不计机会

成本的，如果要再增加农民的劳动供给，由于会带来家庭效用的损失，工业部门必须以更高的工资作为补偿。这样，工资会随劳动供给的增加而增加，劳动供给曲线变为一条斜向上的曲线，是缺乏弹性的。

3、随着中国制造业国际地位的确立，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持续增长，劳动力供给已经由总量过剩转向结构性过剩，低端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未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会进一步催生工资上涨。

在 2010 年中国东部、西部、中部各个区域的劳动力需求-供给比都超过 0.95，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未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会催生出工资上涨的另一股强劲动力。第一，巨大的就业压力将倒逼中国工业化以不间断的速度向前推进。工资上涨是在劳动剩余条件下发生的，在应对工资压力的同时，国家不会忘记就业目标，而带动就业的根本途径就是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可以说，就业扩张与工业扩张已连成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第二，工业化将进入加速期，产值急速扩张带动劳动需求急速膨胀，巨大的劳动需求会形成巨大的推力，推动市场议价型工资超越生存工资的约束，出现持续、强劲的上漲。从工业化自身演进规律看，中国当前正处于从工业化中期的第 I 阶段向第 II 阶段过渡的时期，工业化的重心将从重化工业化转向高加工度化，产业链将拉长、中间投入品的产值比重加大、生产结构将出现多层次化。



4、随着中国重化工阶段和加工贸易化阶段达到顶点。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条件下，过去长期被压抑的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存在回补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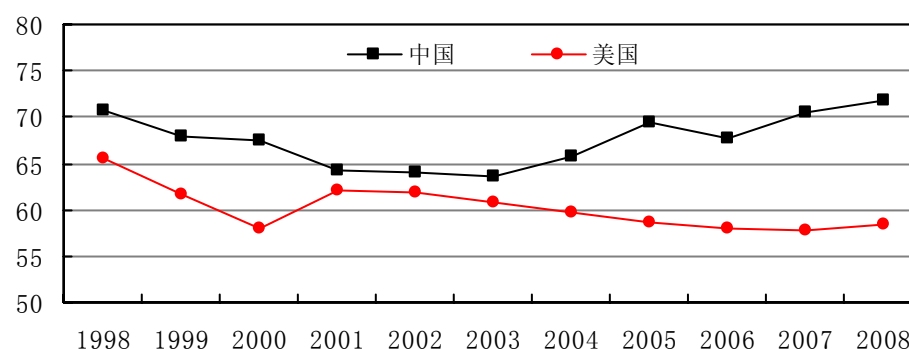
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表明，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入展开，一国相对丰裕的要素需求将增加，而稀缺要素的需求将有所减少，不同国家相同要素的价格将趋于均等。在一般意义上，发达国家的高技能劳动力要素丰裕而低技能劳动力资源相对稀缺，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则恰恰相反。在存在国际贸易的背景下，由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集中在高技术行业，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则建立在低端产业之上。

国际贸易的结果将增加对发达国家高技能劳动力以及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反映在劳动力要素价格上，便是发达国家高技能劳动力报酬和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报酬的上涨。

图 12 描绘了 1998-2008 年中美两国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变化情况。从中看出，随着自由贸易的展开，除去 2000 年外，伴随着对美国低技能工人需求的减少，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平均工资相对于高技能工人出现了持续下滑的趋势。1998 年，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平均工资为高技能工人的 65%，而到了 2008 年，这一比重则下降到了 58%。

中国的情形则与美国呈现出较大不同。与高技能工人相比，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呈现出 U 型变化的趋势。在 2003 年之前，相对于高技能工人，我国低技能工人的平均工资不降反升，相对比重由 1998 年的 71% 下降到了 2003 年的 64%。这既是我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外在反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低端劳动力报酬的过度压低。2003 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重化工阶段和加工贸易化阶段的深化，我国低端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低技能工人劳动报酬也快速上升，相对工资比重由 2003 年的 64% 上升到了 2008 年的 72%，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回补”特征。

图 11 1998-2008 年中国和美国不同技术水平产业的工人相对工资（单位 %）



注：相对工资以低技术行业平均工资占高技术行业平均工资的比重表示。有关行业技术水平的认定请参见 OECD（2007）。美国相关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中国的相关数据则根据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出。

三、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的传导作用将导致中高端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相应变动，最终导致要素市场总体发生变化，促使要素市场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得到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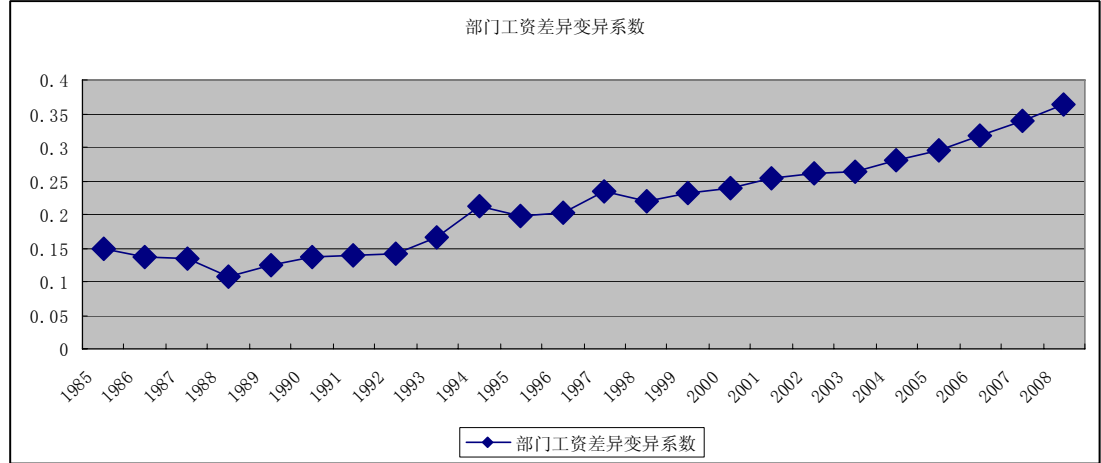
低端劳动力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具有深刻的内涵。低端劳动力市场供求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启动的工资形成机制变革标志着中国经济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增速将进入到一个市场化增长的全新路径。而劳动力摩擦的加

剧，导致劳动法以及最低工资立法的实施力度加强，进一步推动工资水平的上涨。工资形成机制变革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改革，为启动内需和推进城镇化战略提供条件。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导致经济结构的调整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市场机制在结构调整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自发。在要素价格市场化机制的作用下，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将带来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竞争基础。中西部的增长将得到新的释放，大规模、稳定的区域转移将全面开启。

1、工资形成机制变革有助于缩小各部门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通过计算过去 20 多年各部门平均工资水平的变异系数。变异系数等于当年各部分平均工资水平的方差除以均值。变异系数越大，表明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越大。我们发现行业之间的工资差异越来越大。工资市场议价机制有助于解决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异，有利于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

图 12 不同行业工资差异的变异系数



2、工资形成机制变革，有利于居民收入增长。对增加国内需求，对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居民消费支出水平低、增长缓慢，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提高劳动力收入，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工收入，提升农村居民的购买力。可以促使进城务工农民更多的留在城市，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从而刺激内需发展。2009 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为 35.6%，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下图 14 表明，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量长期低于比同期 GDP 增长速度。图 15 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与国际水平相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特别是 2000 年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

图 13 居民消费水平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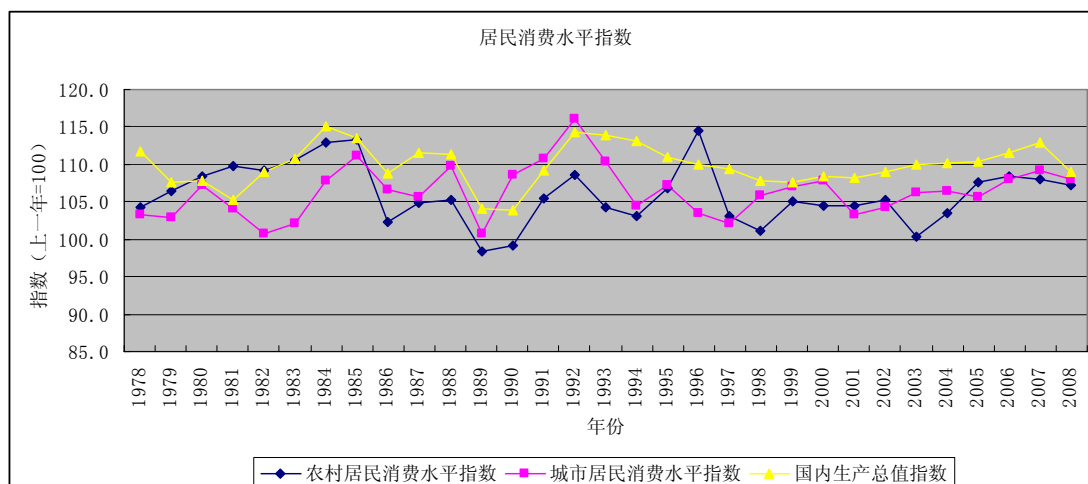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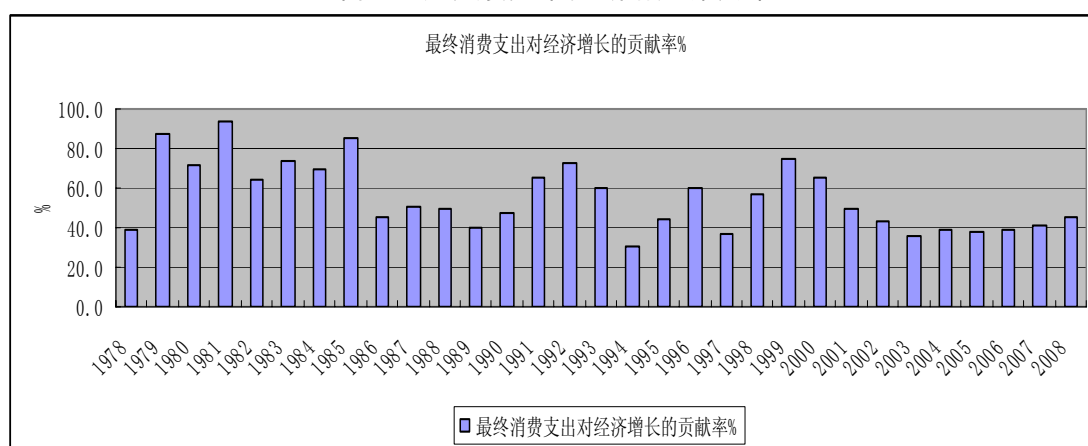


图 14 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3、从长期趋势看，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是促进我国工资上升的根本动因，而技术进步对资本使用效率的影响作用以及资本投入变化则逐渐表现为推动劳动生产效率增长的主要因素。可以预计，这种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特征以及投资快速增长趋势还将继续呈现，工资增长趋势将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

劳动生产效率可以由单位新增劳动所能带来的产出增量来衡量。在动态过程中，劳动投入的变化、资本投入的变化以及技术进步均会引起该指标的变动。其中，资本投入的增加可以提高每单位劳动所能使用的资本要素，从而能够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而技术进步的影响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一方面，有一些技术进步的效果是中性的，即它能够同时提高资本和劳动的生产效率，从而不会对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劳动比率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有些技术进步则是与某种特定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相联系的。例如，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倾向于更大幅度地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而劳动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则会使劳动要素的使用效率获得更快的提高。这一类的技术进步将会对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劳动比率产生显著影响。因

此，对劳动生产效率变化率的分析可以从中性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特定要素使用效率的影响以及要素投入变化的影响几个角度展开。表 2 反映了相应的增长率分解结果。

表 2 我国劳动生产效率变化增长率的因素分解（单位：%）

年份	中性技术进步影响	技术进步对劳动使用效率的影响	技术进步对资本使用效率的影响	资本投入变化的影响	劳动投入变化的影响
1996	4.93	0.73	-0.15	5.27	-0.51
1997	3.71	-0.38	0.10	4.61	-0.49
1998	2.99	1.00	-0.33	4.49	-0.46
1999	2.17	-1.41	0.56	4.10	-0.41
2000	3.01	-1.21	0.54	4.12	-0.38
2001	3.24	0.05	-0.02	4.24	-0.52
2002	3.16	-1.07	0.58	4.61	-0.39
2003	2.44	-2.27	1.36	5.37	-0.38
2004	-2.21	-8.27	5.38	5.68	-0.43
2005	-2.62	-9.23	6.08	6.66	-0.39
2006	3.37	-1.87	1.23	7.43	-0.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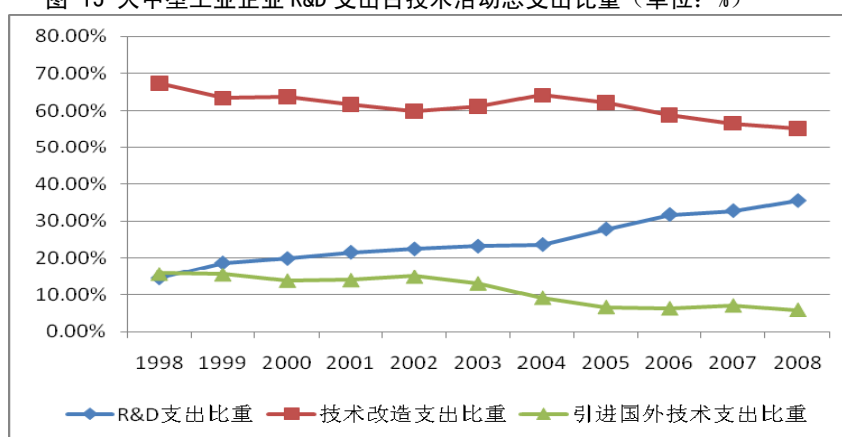
表 1 中五个指标之和即等于单位新增劳动产出增量的增长率。从表 1 的计算结果不难发现，中性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资本使用效率的影响和资本投入的增长是促进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劳动投入的变化以及技术进步对劳动使用效率的影响则对劳动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从技术进步影响作用的构成来看，由于中性技术进步能够同时促进劳动使用效率和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因此它对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效应为正，并且，表 2 计算结果也表明，由中性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较为稳定。技术进步对资本使用效率的影响则呈现出上升趋势，并在 2002 年之后逐步上升为推动劳动生产率变化增长的主要因素。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技术进步对劳动使用效率影响作用的改变：在 2002 年以后，它对劳动生产效率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强。造成这种变化趋势的原因在于，当技术进步整体上倾向于更快地提高资本使用效率时，生产技术与劳动要素投入的匹配程度会逐渐下降，从而降低劳动的使用效率。这不仅会造成实际要素使用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还会对工资产生负面影响。当然，尽管我国的技术进步特性

存在着不利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方面,但由于它倾向于快速地提升资本要素的使用效率,当它与我国资本要素快速增长这一现实相结合时,仍能对劳动生产效率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

(1) 在技术进步的各方式中,引进和模仿国外先进技术为主的趋势还将继续,从而技术进步过程中仍将偏重于提高资本要素的使用效率。

对技术后进国家而言,实现技术进步的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自主研发,还包括对国外技术的模仿、购买国外技术专利、获取专利许可或者与外资合资。在我国技术进步的各项费用之中,尽管 R&D 支出增长迅速,但是在总支出所占比重还处于较低水平。图 16 描述了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 R&D 支出在全部技术活动支出中所占比重。

图 15 大中型工业企业 R&D 支出占技术活动总支出比重 (单位: %)



企业的技术活动经费支出包括 R&D 支出、引进国外技术支出、购买国内技术支出、技术改造支出和消化吸收支出。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手段为技术改造,即应用先进技术成果对企业现有技术和设备进行升级改造。1998 年,技术改造支出比例高达 67.40%。虽然该指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但是到 08 年仍占比 55.11%,以绝对的优势成为企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而从图中还可以看出,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研发支出比重出现了较快增长,在 1998 年至 2008 年之间,该比重年均增长速度约为 9.40%,从 1998 年的 14.45% 上升至 2008 年的 35.46%,但是自主研发仍未能成为我国企业的主要技术进步方式,仅占总投入的三分之一。自主研发发展成我国技术进步的主导因素还需时日。

以上分析表明,技术改造在未来一定时期里,仍将是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而目前技术改造的实践中,对国外线技术的模仿与借鉴是企业改造落后技术的主要途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引进和模仿国外技术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技术与要素禀赋的适宜性。通常而言,国外技术的开发是以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要素

特征为背景的，因此相应的技术更加偏向于提高资本要素的使用效率，并且更适宜于在资本密集型环境下使用。当中国这样的技术后进国家主要依靠模仿和引进国外技术来实现技术进步时，将会出现技术进步与资源禀赋不相匹配的情况。由于至今技术改造和引进国外技术仍然构成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手段，因此我国技术进步对要素使用的倾向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技术特征的影响。而当技术进步倾向于更快地提高资本要素的使用效率时，将进一步产生密集使用资本要素的倾向。

（2）随着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下降，资本要素投入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这一增长模式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尽管在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之后其年均增长率及其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根据 Zheng 和 Bigsten（2008）的测算，在 1978-1995 年之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约为 3.72%，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37%。但在 1995-2005 年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则下降至 1.77%，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则下降至 19%。与这种变化相对应的，是要素投入结构的改变。在 1978 至 1995 年间，中国 GDP 年均增长率约为 10.11%，而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则为 9.19%，低于 GDP 的平均增长速度。但在 1995-2005 年之间，GDP 年均增长率约为 9.25%，而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长率则达到 12.38%，高于 GDP 增长速度 3.13%，资本增长对 GDP 的贡献率也由 1978-1995 年间的 45% 上升为 1995-2005 年间的 67%。这种资本要素投入的快速增长不仅受到前文所提到的技术进步中要素使用倾向的影响，也是中国政府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战略的直接体现。资本要素的快速积累不仅大致抵消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对 GDP 增长的影响，而且也推动了实际的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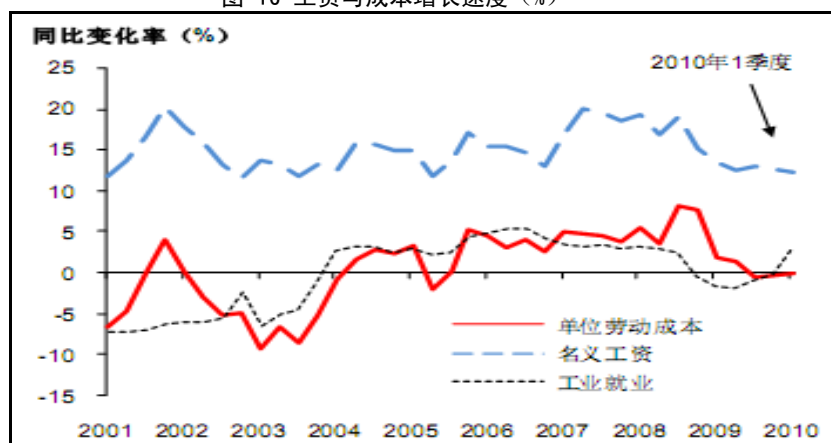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技术进步的基本特征仍以技术改造和引进国外技术为主，而经济增长又日益依赖于资本要素的快速积累，因此可以预计前文所讨论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综合作用下，工资增长趋势仍将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持续下去。

第二部分 工资上涨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尽管工资上涨将给部分出口行业，部分地区和部分产业带来负面冲击，但从总体上说，工资上涨并不会影响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优势，而且工资上涨也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工资的上涨必定会带来成本上涨的压力，但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持续提高，使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并不会在近期转化为通货膨胀的压力。

图 16 工资与成本增长速度 (%)



从 2001-2010 年工资水平上涨的情况来看，实际工资水平平均增速低于 GDP 实际增速，也低于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长速度，因此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从 2001-2010 年并没有增长。在 2008 年-2010 年上半年期间，单位劳动成本快速下降，从 5.1% 下降到 -0.4%（参见图 17）。因此，虽然未来名义工资水平增速可能出现大幅度攀升的趋势，但在短期内企业依然具有消化成本冲击的能力。另外根据人民大学宏观团队的计量研究表明，在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中工资成本推动的因素较弱，中国还没有出现过“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机制”。

利用经 2010 价格修正后的 2007 年投入产出表数据，我们计算了当所有部门工资上涨 10% 的情况下，对各部门成本将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具体计算参见分报告）。

农业受到的影响最大，成本将上升 7.56%，其它受影响较大的行业包括制造业中的食品制造、纺织服装及其制品、纺织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采掘业中的煤炭采选业，公用事业中的水的生产供应。服务业中交通运输仓储邮政相对较小，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稍高，而除此外的其它服务业则受影响最大。此外，木材加工家具制造与建筑业也在平均水平以上。相反，仪器仪表办公用机械制造、石油加工炼焦、通信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等行业受到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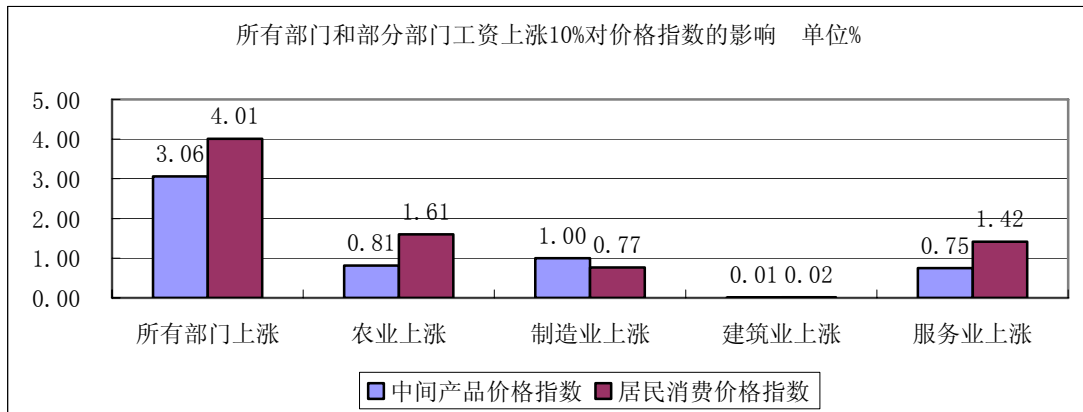
表 3 所有部门工资上涨 10%带来各部门成本上升 单位：%

部门	成本上升	部门	成本上升
农业	7.56	燃气生产供应	2.93
食品制造	4.76	造纸印刷文体用品制造	2.86
纺织服装及其制品	3.86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	2.69
纺织业	3.83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2.67
煤炭采选	3.79	电力热力生产供应	2.64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	3.69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	2.56
水的生产供应	3.63	金属制品	2.56
其他服务业	3.60	化学工业	2.50
木材加工家具制造	3.51	石油天然气开采	2.37
建筑业	3.25	金属冶炼压延加工	2.20
非金属矿采选	3.22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2.18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3.09	仪器仪表办公用机械制造	1.98
金属矿采选	3.05	石油加工炼焦	1.93
非金属矿物制品	2.96	通信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	1.66

二、工资上涨并不会对所有行业形成同样的冲击。不同行业工资上涨对价格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工资上涨的影响较大，而建筑业和制造业工资上涨对价格的影响相对较小。

根据投入产出分析，如果成本的上涨完全转嫁为价格的上涨，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上述情形下价格指数的变化。所有部门工资上涨 10%，利用投入产出数据计算的中间产品价格指数将上涨 3.05%，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上涨 4.01%。

图 17 工资上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



工资上涨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图 18 描绘了 2008 年不同类型企业制造业细分的平均工资水平。不同类型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国有单位企业平均工资相对较高，而城镇集体企业的工资水平相对较低。要素价格市场化机制形成，内在要求同一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工资趋向均等化。因此，城镇集体单位企业的工资可能首先上涨。集体企业受到工资上涨的影响较大。图 19 通过时间变化趋势描绘了不同类型企业平均工资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城镇集体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长期低于全部注册类型平均工资，因此集体企业工资水平有更强烈的上涨要求。

图 18 2008 年全国按注册类型和行业划分平均工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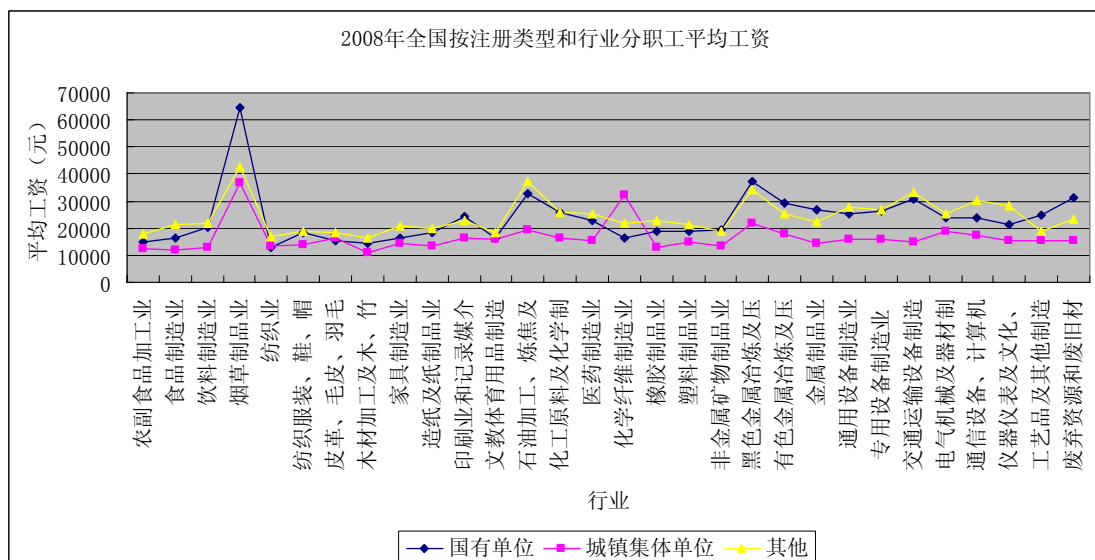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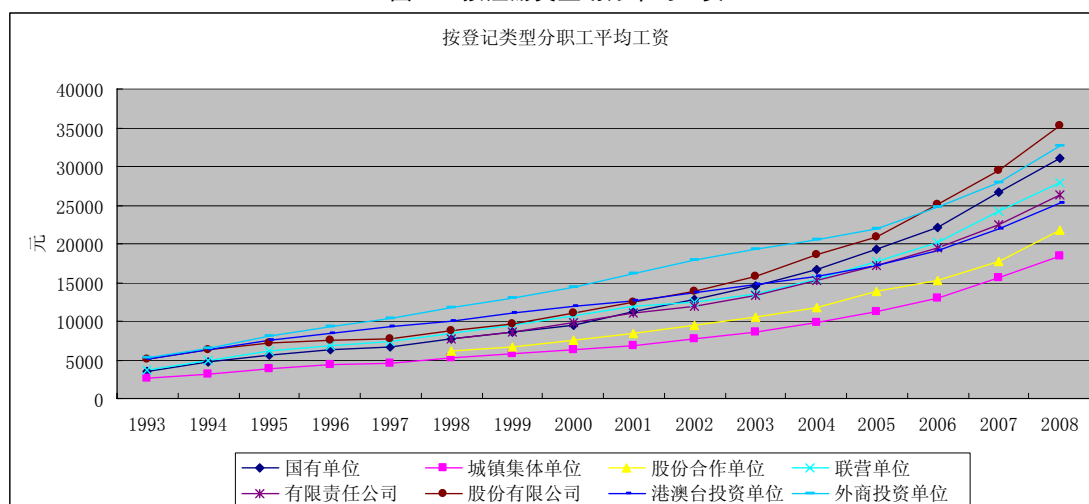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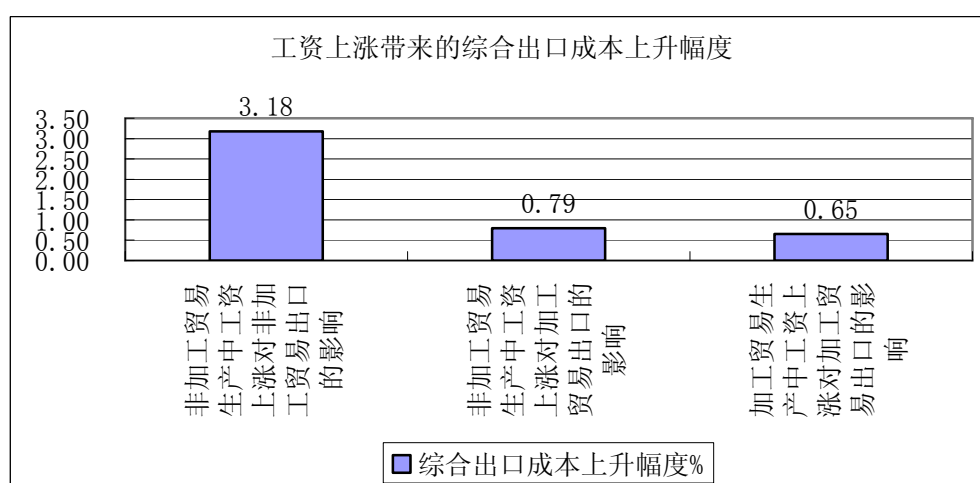
图 19 按注册类型划分平均工资



三、从对出口的影响来看，工资上涨并不会对我国出口比较优势带来根本性的改变。非加工贸易出口品的生产受到工资上涨的影响较大，而加工贸易出口品的生产则受工资上涨的影响相对较小。

非加工贸易生产中所有部门工资同时上涨 10%，将带来非加工贸易出口综合成本上升 3.18%，对加工贸易出口综合成本只带来 0.79% 的上涨，而加工贸易生产中所有部门工资同时上涨 10% 则只带来加工贸易出口综合成本上升 0.65%。由于加工贸易生产的产品全部用于出口，因此加工贸易生产中的工资上涨将不对国内使用产品和非加工贸易出口品产生任何影响。加工贸易生产受工资的上涨的冲击远小于一般贸易品生产（见下图 21）。

图 20 工资上涨对出口成本的影响



从部门结构上看，通信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化学工

业这些占加工贸易出口最大份额的部门受工资上涨的影响并不大，反而是一些基础原材料部门，如农业、木材加工家具制造业等部门受工资上涨的影响最大。这种结构上的错位也大大降低了加工贸易受工资上涨的影响。

四、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利于我国出口产业结构和出口地区结构的优化调整。劳动力成本效应为正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学品行业、金属制品业等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中技术水平行业，以及机械制造业、电器制造业等高技术水平含量的制造业。由于这些行业的行业特性优势，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但不会制约这些产业的发展，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这些产业贸易竞争力的提高。

劳动力的成本效应在不同的行业存在着显著差异。劳动力成本效应为负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食品制造业、纺织业、服装业、制鞋业和家具业等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伴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逐渐上升，我国这些产业的发展将遇到较大的挑战。这其中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纺织业和服装制造业。与其他劳动密集型行业相比，这两个产业在当前我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当前的贸易竞争优势也比较明显。因此，相对于其他劳动力成本负效应的行业而言，劳动力成本上涨对这两个行业的冲击可能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相对较大的影响。

劳动力成本效应为正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学品行业、金属制品业等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中技术水平行业，以及机械制造业、电器制造业等高技术水平含量的制造业。由于这些行业的行业特性优势，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但不会制约这些产业的发展，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这些产业贸易竞争力的提高。同时，由于机械制造业、电器制造业在我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这两个产业在出口中的份额之和几乎接近我国对外出口的 50%，因此，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不但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出口产品技术构成，对我国整体出口规模的扩大也具有促进作用。

劳动力成本效应不显著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皮革业、印刷出版业和钢铁制品业等制造业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因此，即便劳动力成本上涨会对这些行业的贸易竞争力产生影响，其对我国整体出口的影响也几乎微乎其微。

表 4 劳动力成本上涨对我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影响

行业代码及名称		出口份 额	净出口率指数	Michaely 指数	2009 年中国出 口份额
劳 动 力 成 本 效 应	食品制造业	-0.21	-0.06	-0.009	1.64
	烟草加工业	-0.15	-0.05 ^a	0.001	0.04
	纺织业	-0.03	-0.005	-0.01	5.98
	服装业	-0.29	-0.08	-0.012	8.04

为负的行业	制鞋业	-0.13	-0.05	-0.005	2.26
	木材行业	-0.13 ^a	-0.02 ^a	-0.002	0.58
	家具业	-0.14 ^a	-0.05	-0.001	2.02
	陶瓷制品业	-0.21	-0.09	-0.0003	0.26
劳动力成本效应为正的 行业	工业化学品行业	0.11	0.03	0.004	3.29
	其他化学品行业	0.12	0.05	0.01 ^a	1.22
	石油加工业	0.15	0.08	0.006	0.67
	石油及煤制品杂项	0.54	0.15	0.002	0.23
	橡胶制品业	0.23	0.03	0.0002 ^a	0.77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0.05	0.001	0.70
	金属制品业	0.26	0.02	0.001	3.01
	机械制造业（除电器）	0.42	0.10	0.02	20.59
	电器制造业	0.38	0.03	0.006	22.28
	交通设备制造业	0.16 ^a	0.02	0.004	6.71
	专业及科学设备制造业	—	0.07	0.004	2.90
劳动力成本效应不显著的 行业	饮料行业	—	—	—	0.06
	皮革业	-0.15	0.12	0.004	1.12
	造纸业	—	—	—	0.68
	印刷出版业	-0.11	0.03	—	1.84
	塑料制品业	-0.15	0.03	—	1.19
	玻璃制品业	-0.20	0.03	—	0.94
	钢铁制品业	—	0.09	—	2.47
	有色金属业	—	0.08	—	1.31

注：表格中的第 3,4 和 5 列分别代表采用出口份额、净出口率指数和 Michaely 指数作被解释变量时，劳动力成本的系数。—代表系数不显著，a 则代表劳动力成本的一期滞后项不显著情况下采用的二期滞后项系数。最后一列为 2009 年中国各产业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

表 5 劳动力成本上涨对我国出口地区结构的影响

	行业代码及名称	美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荷兰	日本	印度	韩国
劳动力成本效应为负的行业	食品制造业	3.86	4.18	4.56	9.44	2.34	5.91	6.59	4.06
	纺织业	3.86	4.18	4.56	9.44	2.34	5.91	6.59	4.06
	服装业	8.13	11.2	14.5	14.1	6.00	16.1	0.21	3.83
	制鞋业	3.98	1.97	2.6	1.87	1.36	2.00	0.36	0.64
	家具业	3.76	1.98	2.86	1.77	1.57	2.07	0.51	0.77
	总计	23.6	23.5	29.1	36.6	13.6	32.0	14.3	13.4
劳动力成本效应为正的 行业	工业化学品行业	2.03	2.66	1.47	3.54	3.15	3.49	11.2	5.43
	其他化学品行业	1.09	1.90	1.86	1.60	1.11	1.02	3.65	1.08
	金属制品业	3.25	3.38	3.04	3.65	2.74	2.18	4.14	3.11
	机械制造业（除电器）	25.5	23.7	26.8	15.9	38.7	17.0	22.4	15.4
	电器制造业	20.4	20.7	18.8	16.9	20.0	17.6	25.9	28.5
	交通设备制造业	4.71	8.66	5.94	9.12	4.96	4.93	7.10	4.90
	专业及科学设备制造业	2.04	2.66	1.22	1.63	1.14	2.27	2.17	3.29
	总计	59.0	63.7	59.1	52.3	71.8	48.5	76.6	61.7

注：单元格中的数字表示的是中国对外出口中某一行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单位为%。同时，由于表 6 中所分析的国家在行业 331,361,353,354,355,369 中的出口份额较小，大部分数值都不足 1%，所以我们实际分析时不再对这些行业加以考虑。

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背景下，不但我国出口的产业结构面临调整，地区结构也将会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在低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我国出口地区结构的变动主要体现在纺织业和服装业。由于在对外出口中，纺织业在对意大利、印度和俄罗斯的出口中比重较高，因此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国纺织业对这些国家

的出口将下降较多。而对于服装业而言，受劳动力成本上涨影响较大的出口地区主要集中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将不利于我国服装业对这些国家出口贸易的展开。

同时，就机械制造业而言，由于美国、德国、法国和荷兰对我国制造业产品的进口较为集中，因此，伴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我国对美国 and 欧洲地区的机械制造业产品出口有望进一步增加。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电器制造业领域，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的背景下，美国、德国、法国和韩国在我国电器设备制造业出口中的地位将会进一步得到巩固。而对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而言，由于这一产业的产品在对德国市场的出口中相对更为集中，因此可以预计，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将会推动我国对德国出口数量的增加。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印度。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是被视为中国的竞争对手而存在的。但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背景下，由于劳动力成本效应为负的行业，在我国对印度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较低，而劳动力成本效应为正的产业，在我国对印度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却相对较高。因此，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印度可能是下一个我国潜在的重要出口市场。

五、工资上涨不会对我国制造业的大国地位形成根本冲击，从中美贸易关系看，中国对美国出口具有较为显著的互补性优势，中国外贸发展的外部需求基础稳固。从单位劳动成本的跨国比较看我国对外贸易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美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的脱钩趋势日益明显。具体来说，虽然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特征进一步强化，但从消费和产出的缺口来看，伴随着制造业的逐渐萎缩，美国居民消费特别是耐用品居民消费的缺口却成持续扩大之势。而在开放的背景下，这样的一种产出缺口只能通过进口需求来加以满足。相应地，在美国居民消费中，对进口产品的消费特别是对进口耐用品的消费比例在逐渐增加。从图 22 可以看出，美国居民消费中进口产品所占的比重呈现出稳定上升之势。进口消费产品占总消费的比重从 1989 年的 7.12% 逐渐上升到了 2008 年的 14.2%。这一点，在耐用品进口消费上反映的尤为明显。在 1989-2009 年间，美国居民耐用品消费中，进口产品的比例增加了整整一倍，由 10% 上升到了 20%。而进一步分析美国消费品进口的国别构成，我们发现美国从中国消费品进口的增长成为美国进口需求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从图 23 可以看出，在 1989 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占总进口的比重尚

不到 10%，之后持续增加，并在 1994 年首次超过 20%。进入新世纪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比重迅速增加，到 2009 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耐用品和非耐用品品比重分别达到了 48.8%和 28.0%。

图 21 美国居民消费中进口产品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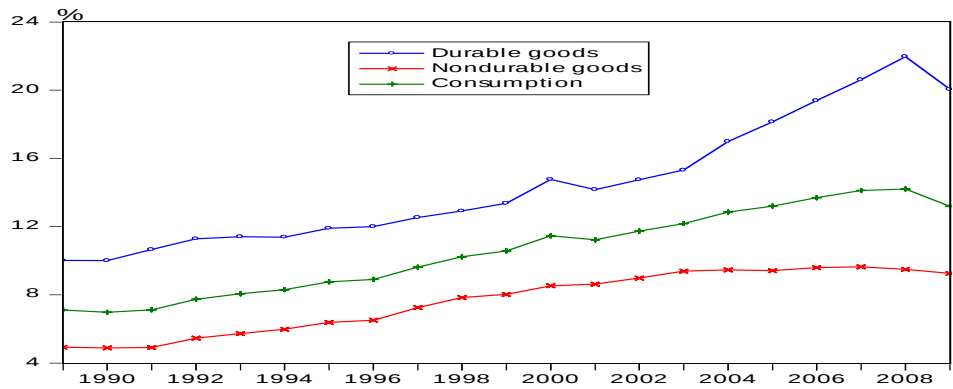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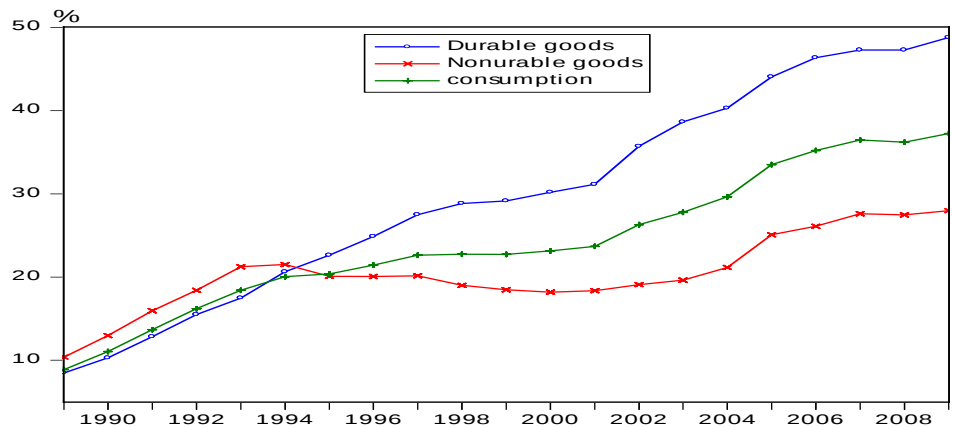


图 22 美国从中国进口消费品在进口消费中的比重



注：1989-2008 年数据及进口消费产品的分类均来源于章艳红（2009），2009 年数据来源于美国 USITC 数据库。

美国居民进口需求的增加对应的是外围国家整体的发展空间，能否充分利用这样的一种发展机遇仍然取决于外围国家的经济条件特别是贸易发展状况。这其中，双边贸易的互补性与否至关重要，而当前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互补性优势则为我国未来贸易发展空间的拓宽创造了可能。

表 6 2009 年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国家	时间	劳动密集型产品			资本密集型产品	
		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杂项制品	化学和相关产品	机械和运输设备	未分类的商品
中国	2000	1.00	3.71	0.33	0.87	0.09
	2001	0.95	3.47	0.34	0.93	0.13
	2002	0.95	3.37	0.30	1.02	0.11

	2003	0.91	3.20	0.30	1.12	0.09
	2004	1.01	3.01	0.28	1.18	0.07
	2005	1.04	2.95	0.30	1.21	0.08
	2006	1.16	2.83	0.30	1.20	0.05
	2007	0.73	1.85	1.03	1.30	0.95
	2008	0.77	1.84	1.02	1.30	0.86
	2009	0.34	0.98	1.42	2.79	0.03
德国	2009	1.02	0.82	1.29	1.18	1.65
巴西	2009	0.46	0.82	0.50	0.32	0.59
印度	2009	0.70	1.58	0.44	2.03	0.96
马来西亚	2009	0.40	0.57	1.35	1.05	0.18
墨西哥	2009	0.29	0.48	1.57	1.16	0.50
韩国	2009	0.69	0.85	1.64	1.14	0.17
日本	2008	0.59	0.80	1.79	0.79	1.15

注：以上产品是按国际贸易标准（SITC）第四版分类原则进行分类，贸易互补性指数以美国的贸易伙伴国对美国的出口进行计算。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统计司数据库（UNCOMTRADE）的数据整理计算。

从表 6 可以看出，2009 年中国与美国贸易互补性较强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杂项制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上。而从这些产品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在这些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这一点，在机械和运输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上反映的尤为明显。这说明中美两国在这些产业上蕴含着较大的贸易利益，而这既是美国进口消费品进口中国元素持续增加的内在原因，也为今后中美两国贸易的持续扩大奠定了现实基础。同时，在 2000-2009 年间，中国同美国的互补性结构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在 2006 年之前，中国同美国的贸易互补性主要体现在杂项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而在 2000 年之后，以机械和运输设备上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互补性逐渐增加，由 2000 年的 0.87 逐渐上升到了 2009 年的 2.79。与之相对应，中美两国在机械和运输设备上的贸易规模也在迅速的增加。2000 年中国对美出口的机械和运输设备总额为 183 亿美元，仅占当年美国第一进口国——日本出口额的 16.7%。2003 年，中国在此产品上的对美出口额为 429 亿美元，成为美国此类产品的第五大进口国。而到了 2007 年，中国成功超越墨西哥，成为当年美国的第一进口国。假若这一发展趋势能够加以维持的话，中国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的对美出口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由于在劳动力价格变动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单位劳动成本能更好的反应劳动力成本的变动情况。而从世界几个主要国家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的相对大小来看，我国的对外贸易仍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表 7 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的跨国比较（1980-2007，中国=100）

	美国	德国	日本	韩国	巴西	印度 尼 西 亚	印度
1980	447	434	310	181	—	130	312
1990	363	378	281	153	116	72	215
1995	454	546	395	173	155	148	230
1996	492	596	428	194	236	140	258
1997	529	633	468	199	251	—	292
1998	620	725	552	198	293	169	245
1999	644	753	563	201	254	163	247
2000	726	824	598	236	256	169	302
2001	770	866	661	262	262	259	313
2002	759	866	655	268	249	191	290
2003	798	891	650	285	256	228	277
2004	778	871	640	268	254	184	247
2005	745	838	617	276	264	181	—
2006	735	797	616	276	—	—	—
2007	750	796	—	—	—	—	—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UNIDO 和 OECD STAN 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从表 7 可以看出，在 1980-2007 年期间，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点，相对于发达国家表现的尤为明显。在 1980 年，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分别是中国的 4.5、4.3 和 4.1 倍，而到了 2006 年，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尚不足美国、德国和日本平均单位劳动成本的 1/7。而同几个主要的贸易竞争对手相比，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优势也是非常的显著。整体上看，上世纪 90 年代之后，中国相对韩国、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劳动成本优势一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平均尚不足这些国家的二分之一。在 2001 年之后，虽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相对于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有所下降，但降幅不大，当前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仍在中国的两倍左右。因此，从相对层面来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还将在很长一个时间内得以保持。

第三部分 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机制的开启与培育

近年来，政府一直非常重视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自 2002 年以来，尤其强调产业升级和区域调整。但是收入结构、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却在持续加深。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居高不下，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仍然相对缓慢。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调控并不能从根本上把握需求的动向，无法根据国际分工发展的规律来确定未来产业的定位，从而产生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大规模政府失灵问题，一个明显的案例是越是政府管控的产业部门，产能过剩问题越严重。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促使企业自发地、内生地进行产业调整，以适应国际分工变化、国内消费升级、技术进步的需求。工资上涨将加速产业梯度转移，巩固我国的贸易地位，提升消费。以企业自发调整为主体的中国市场化结构性调整将全面展开，并将取代以往行政性结构调整，改变以往结构性调整缺少支点的困境，使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更多地反映了市场机制的要求。

一、工资形成机制的革命将带来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从而启动中国市场化收入倍增变化，并加速中国“收入-消费升级”的台阶效应的到来。这种变革必将改变中国工资占 GDP 比重过低和消费启动大大落后于同类国家的局面，从而加速推进中国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

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看，工资上涨趋势十分明显，2000 年后，实际工资增幅也在 10% 左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工资总额占 GDP 比重呈下降趋势。平均工资上涨与工资总额占比下降的反差恰好说明，工资形成机制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适应，劳动者报酬价格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比增长。劳动力价格长期偏低，工资形成机制扭曲，导致收入分配改革困难重重。

图 23 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及实际工资涨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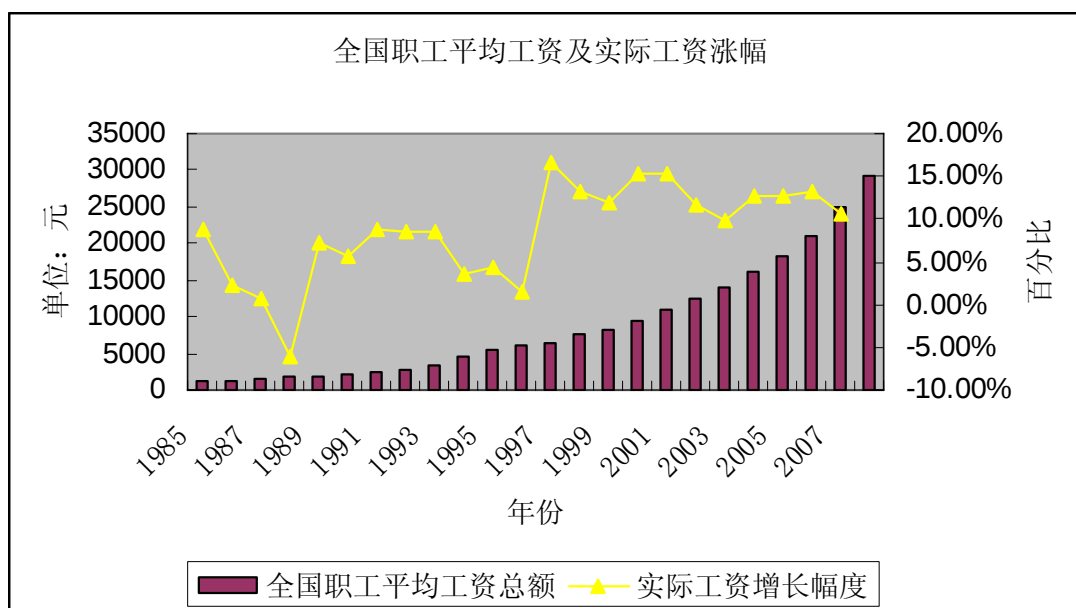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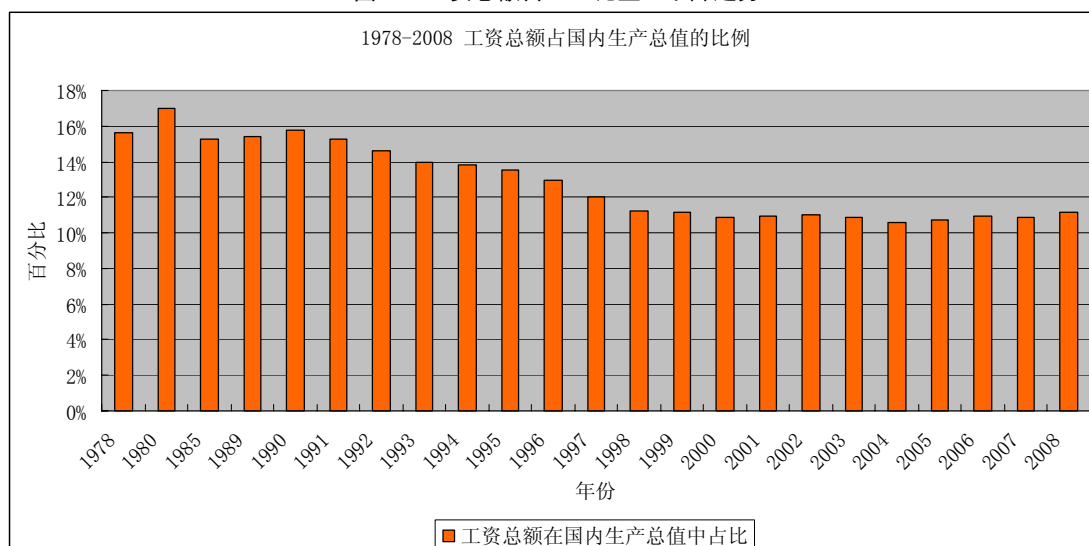


图 24 工资总额占 GDP 比重呈下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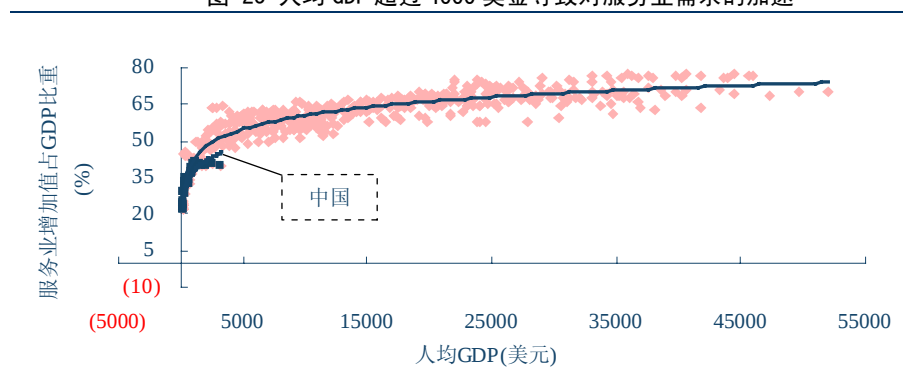
农民工的工资形成机制由以往的“生存工资定价法”向“劳资双边协商定价机制”的转变是中国市场化工资形成机制变革的核心。因为它不仅推动了低端劳动力工资与正常劳动生产效率增速同步增长，而且它也必将成为其他层级工资形成机制改革的风向标。这种变革必将改变中国工资占 GDP 比重过低和消费启动大大落后于同类国家的局面，从而加速促进中国的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

表 8 中国各阶层可能分别同时处于“收入-消费台阶效应”的临界点

	2008	2009
农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美元）	840	930
城市家庭人均实际收入（美元）	2500	2800
京沪城市家庭人均实际收入（美元）	4200	4700
全国人均 GDP（美元）	3323	3602
京沪人均 GDP（美元）	9967	10864

从全国整体水平来看，人均 GDP 超过 3000 美金，意味着消费结构将全面进入工业化消费时代，消费升级将快速展开；从农村来看，到 2008 年家庭人均现金收入超过 800 美元，2009 年超过 900 美元，刚好处于跨越国际温饱线，向工业化消费迈进的临界点；从城市来看，2008 年城市家庭人均收入达到 2500 美元，2009 年向 3000 美元逼近，刚好处于工业化消费升级的变异点；从国家发达区域来看，京沪两地的人均 GDP 超过 10000 美元，人均家庭实际收入接近 5000 美金，标志着这些处于开始步入国际高收入阶段，处于向后工业消费模式转变的时点（参见表 8）。另外，到 2011 年，中国人均 GDP 将步入 4000 美元大关，按照一般的消费层来看，中国也将步入对服务业需求加速的阶段。而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无疑将使上述台阶效应加速到来。

图 25 人均 GDP 超过 4000 美金导致对服务业需求的加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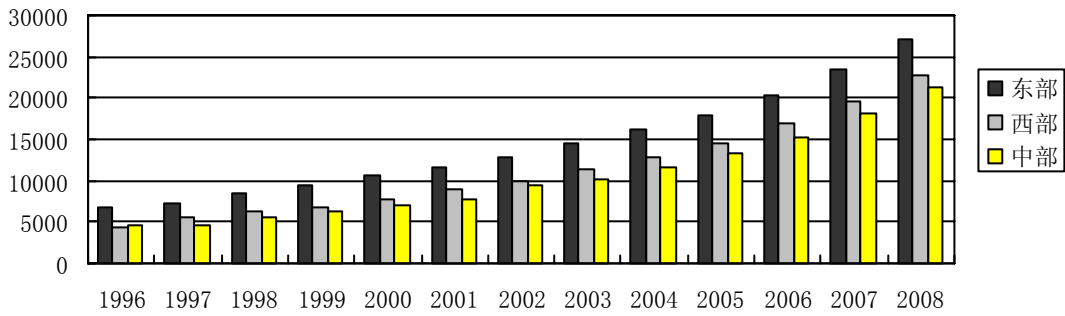


二、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将加速推行中国产业在区域上的“梯度转移”，并使中国产业在“加速性梯度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克服以往行政化产业转移带来的各种问题。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这一点在地区间劳动

力工资的差异上反映的也较为明显。从图 27 可以看出，在 1996-2008 年期间，我国不同地区间，制造业部门的年平均工资呈现出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的平均工资要显著高于我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平均而言，在 1996-2008 年期间，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平均工资比西部地区高出了 29.8%，而比中部地区高出了 40.8%。事实上，即便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从单位劳动成本的地区比较看，我国不同地区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也是非常显著的。在 2008 年，我国不同地区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特征非常明显。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和福建成为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省市，而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的省份则是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整体而言，以北京为基准省份，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为 54.41，而中部地区则只有 47.1。因此，综合这两个方面的考虑，在未来东部地区制造业转移方向的选择上，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会是比较理想的移入地，而这必然会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地位的维护和巩固起到一定的强化左右（参见分报告）。

图 26 我国不同地区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工资（1996-2008 年）



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将大大压缩东部区域产业生存的空间，从而导致产业自动向中西部转移。事实上东西部人均工资随着劳动力供求的变化而发生了巨大分化，到 2009 年东部人均工资高出中西部人均工资接近 30%，而土地价格高出东部 40%多。这直接推动很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以及东部产业的自发升级。同时，东部各种劳资关系的恶化也使大量资本向中西部转移，以谋求要素套利和制度套利。例如 2009 年外资流入的区域分布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同时，很多行业的代表性企业也纷纷向内陆布局。

为了清晰比较不同地区的行业间劳动报酬差距与产业转移的关系，进一步将 31 个地区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带，选取东中西部地区的 20 个制造业行业为研究对象，以 2001 年和 2007 年的时间截面数据作对比分析。由表 9 可以看出，从 2001 年到 2007 年制造业各个行业劳动报酬都快速上涨，2007 年的劳动报酬水平普遍达到 2001 年的两倍多。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劳动报酬行业波动较为同

步，两大地带上涨最快的行业是烟草行业，分别增长了 1.5 倍和 2 倍，两大地带上涨最慢的行业是通讯设备，也达到 50%和 70%的增长率；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各行业劳动报酬也快速上涨，涨幅最大的行业是专用设备制造业，这一行业的劳动报酬波动与中部地区一致，上涨 1.9 倍。

表 9 2001 年和 2007 年东中西部分行业劳动报酬涨幅比较

平均劳动报酬	东部		中部		西部	
	绝对值	相对值	绝对值	相对值	绝对值	相对值
食品加工业	7873	103.0%	8527	159.2%	5992	80.7%
食品制造业	9504	87.2%	6767	113.4%	6726	96.2%
饮料制造业	10811	99.1%	7459	115.7%	8071	87.8%
烟草制造业	42687	150.0%	28996	195.0%	29413	141.9%
纺织业	7866	98.7%	5596	105.2%	5207	83.2%
造纸	10084	107.4%	7945	135.4%	5888	88.3%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18242	97.0%	10287	85.2%	13449	101.0%
化学原料制品制造业	14075	119.8%	10065	146.7%	11218	132.7%
医药制造业	11142	72.7%	7274	101.3%	7206	68.9%
化学纤维制品业	10169	87.3%	10197	123.3%	3670	32.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9049	102.7%	8035	137.9%	6502	91.1%
黑色金属加工业	17185	118.1%	18008	146.1%	14360	128.9%
有色金属加工业	9132	78.4%	12926	103.2%	13169	114.5%
金属制品业	9228	84.0%	9419	174.6%	8812	118.8%
通用设备制造业	14061	128.1%	10029	142.7%	13779	175.1%
专用设备制造业	13369	126.7%	12358	186.5%	14735	185.2%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5539	109.6%	12854	116.7%	12451	126.4%
电气机械器材制造	9223	73.8%	10155	138.5%	11282	126.8%
电子通信设备制造	9024	48.9%	6704	72.6%	9292	102.5%
仪器仪表机械	10820	81.5%	8507	118.2%	10535	131.2%

表 10 2001 年和 2007 年东中西部分行业单位劳动成本比较

单位劳动成本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1	2007	2001	2007	2001	2007
食品加工业	0.13	0.09	0.1	0.07	0.15	0.07
食品制造业	0.19	0.16	0.14	0.09	0.18	0.09
饮料制造业	0.13	0.12	0.13	0.09	0.14	0.08
烟草制造业	0.05	0.03	0.05	0.04	0.04	0.04
纺织业	0.23	0.19	0.28	0.16	0.37	0.17
造纸	0.19	0.15	0.18	0.1	0.24	0.16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0.11	0.06	0.11	0.1	0.08	0.1
化学原料制品制造业	0.18	0.11	0.2	0.13	0.25	0.14
医药制造业	0.2	0.15	0.13	0.1	0.15	0.1
化学纤维制品业	0.18	0.11	0.28	0.18	0.24	0.1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22	0.16	0.24	0.12	0.34	0.17
黑色金属加工业	0.19	0.09	0.25	0.11	0.26	0.12
有色金属加工业	0.16	0.08	0.28	0.08	0.25	0.09
金属制品业	0.23	0.19	0.18	0.11	0.25	0.16
通用设备制造业	0.25	0.2	0.33	0.15	0.34	0.18

专用设备制造业	0.25	0.2	0.27	0.16	0.4	0.21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22	0.17	0.19	0.13	0.3	0.17
电气机械器材制造	0.18	0.17	0.17	0.1	0.28	0.11
电子通信设备制造	0.17	0.2	0.12	0.11	0.15	0.13
仪器仪表机械	0.26	0.23	0.3	0.12	0.35	0.17

利用单位劳动成本的计算公式我们推算了 2001 年和 2007 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制造业分行业单位劳动成本（见表 10）。虽然 20 个制造业行业的劳动报酬都上升很快，不论哪一个行业在几年间劳动报酬都经历了快速的增长。但是从单位劳动成本变化来看不同行业在各个地区间确实存在差异，变化的速度和方向都各有不同。

从单位劳动成本的方向来看，绝大多数行业在劳动报酬上涨的同时单位劳动成本呈现下降趋势，2007 年只有东部地区的电子通信设备制造、西部地区的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单位劳动成本比 2001 年高，2007 年西部地区的烟草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与 2001 年相持平，其余行业在各地区单位劳动成本都呈下降趋势。

从三大地带各行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变动幅度来看，东部地区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黑色金属加工业、有色金属加工业单位劳动成本降幅较大，2007 年单位劳动成本几乎下降为 2001 年的一半；中部地区部分行业单位劳动成本的降幅相对东部地区较明显，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加工业、有色金属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机械等行业 2007 年的单位劳动成本不大于 2001 年的一半；西部地区部分行业单位劳动成本降幅更大，从劳动密集型、资源依赖型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从各行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在三大地带的对比来看，表 10 中制造业 20 个行业中，2001 年东部地区单位劳动成本最低的有 11 个行业，其中两个和中部地区并列最低；中部地区有 10 个行业单位劳动成本最低；西部地区的石油加工及炼焦业行业在三大地带中单位劳动成本最低。到 2007 年，各行业的最低单位劳动成本大多发生了变化，东部地区只有 6 个行业单位劳动成本最低，其中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的单位劳动成本是新降下来的，也就是说 2001 年东部拥有的 11 个单位劳动成本优势行业到 2007 年时失去了 6 个行业的单位劳动成本优势。而中部地区的数据显示最低单位劳动成本行业的拥有量激增至 14 个行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源依赖型行业；西部地区具有单位劳动成本优势的行业也增至 4 个，其中 3 个行业与中部地区并列最低单位劳动成本。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2001 年东部地区的部分行业单位劳动成本比中部和西部地区低很多，到 2007 年中部地区的单位劳动成本优势更为突出，而三大地带之间的单位劳动成本差距在缩小，甚至趋于一致。中西部地区在逐年大幅提高劳

动报酬的背景下，实现了单位劳动成本的快速下降，并且在大部分行业具有单位劳动成本优势，也从侧面反映出东部地区需要产业转移的迫切性和可行性。

三、长期来看，低劳动力成本会严重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有利于克服以往行政化产业升级和政府主导型的技术替代带来的各种问题。

1. 劳动力工资水平低会使得相对劳动力而言资本的价格显得更加昂贵，那么企业对廉价劳动力这一资源进行过度使用，而不愿意投资新设备和新技术。

提高工资水平，使得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降低，那么进行技术改进和设备更新的相对成本就会下降，从而有利于促进企业加大设备投资和技术改进的力度。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方面，日本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日本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调整战略，走高工资、高生产率的道路。高工资逼着日本企业增加技术含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由于我国多数产业和企业长期以来依赖低劳动成本进行赢利，致使我国国家研发支出和企业研发支出均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如下图所示，2007 年，我国研发支出占 GDP 的 1.59%，低于韩、英、美、日、德等国，也低于 OECD 平均水平（2.29）。韩国研发支出占比最高，为 3.47%。

图 27 部分国家研发支出在 GDP 中的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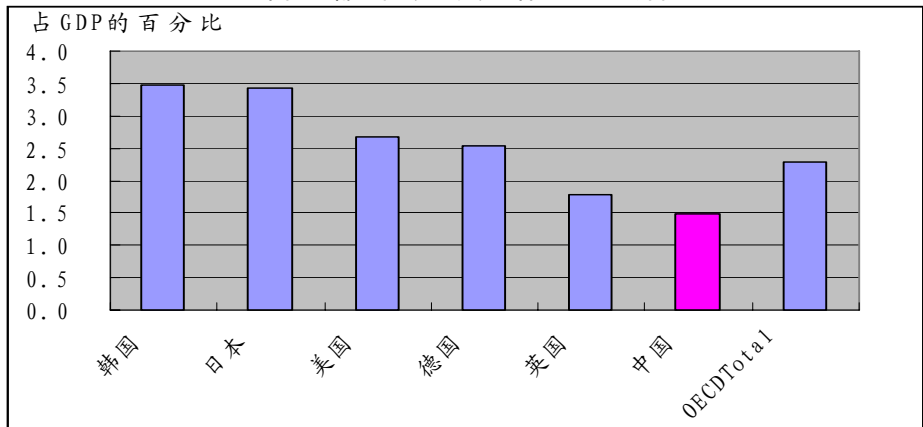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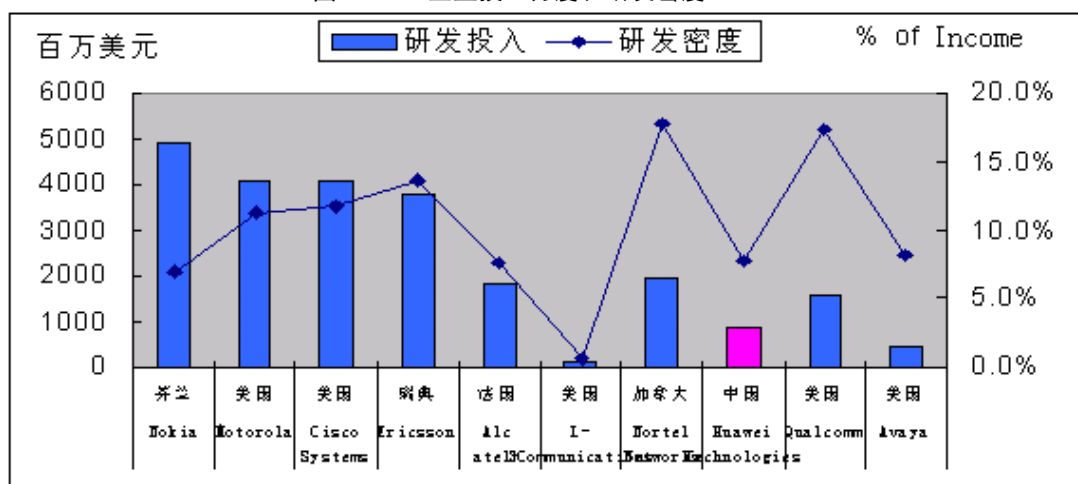


图 14 我国与美英韩等国研发投入力度比较

数据来源：Science and technology, OECD 2009

我国的一些科技顶尖企业在研发投入量和投入密度上也与国外顶尖企业存在较大差距，比如思科研发投入约为 27 亿美元，华为是我国最重视研发的企业，2006 年实际投入为 8.5 亿美元；研发密度也处于中下游。我国电子百强企业研发总投资 2007 年为 480 亿元，而研发投入排名全球第三的三星电子一家就有 60.04 亿美元。比如，图 29 中的 ICT 企业投入力度和研发密度，我国在薄弱的基础之上仍与有关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图 28 ICT 企业投入力度和研发密度



数据来源：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look, OECD 2008

2. 基于低劳动力成本的“世界工厂”使我国多数行业处于国际分工低端。

在国际分工中，我国处于低端，对高端存在较强的外部依赖性，承担生产制造和“消费”角色。比如，我国汽车产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最盈利部分之一的汽车行业零部件生产和提供仍被跨国企业所控制。截至 2007 年底，世界 100 强汽车零部件企业中 70% 在中国设厂，在中国投资零部件企业高达 1200 家。发动机控制代码技术完全由跨国企业垄断，如博世 60%、德尔福 30%。

表 11 国际分工类型及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价值链类型	代表性产品或行业	控制方式	跨国公司与我国企业的分工
✓技术驱动	✓半导体行业	✓内部化 (基于股权控制)	✓技术优势保留在跨国公司内部 ✓我国等低工资国家，承担劳动密集型的装配和测试任务
✓生产驱动	✓汽车行业	✓混合 基于股权和非股权控制	✓发达国家提供品牌，制造工艺和设备 ✓我国提供低成本劳动力、优良的投资环境和广阔的市场
✓市场营销驱动	✓服装行业	✓外部化 基于非股权控制	✓跨国公司负责服装的设计和营销 ✓我们承担产品的技术实现和生产环节
✓服务驱动	✓软件行业	✓内部化 基于股权控制	✓跨国公司设立子公司 ✓我们承担部分服务外包

根据要素禀赋论，各国生产自己具有优势的产品与他国交换。但是这种以互通有无为目的的国际贸易已很少，甚至不复存在，国际市场越来越倾向于以需求为导向的生产。从需求结构来判断，劳动密集型产品日趋饱和，而国际消费需求结构、投资需求结构已经向更高层次转换。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仍然主要是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及贡献率一直很低。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出口

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弹性小、附加值低，利润率较低，缺乏国际竞争力。如图 30, 在“微笑曲线”中，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再到售后服务, 产品的各个业务工序按附加值的高低进行排列。在许多产业中, 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利润水平不同, 即上游和下游的利润高, 中游的利润低, 中国的加工贸易就位于这条曲线的中游部分, 即利润和附加值最低的环节。中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贸易优势都是由于廉价的劳动力,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这个生产阶段存在激烈的竞争。随着竞争的加剧, 利润会越来越少, 微笑曲线也会因此变得越来越陡峭, 如图中的细线部分。这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价格相比越来越低, 导致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致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陷入“贫困化增长”, 技术水平和资本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越来越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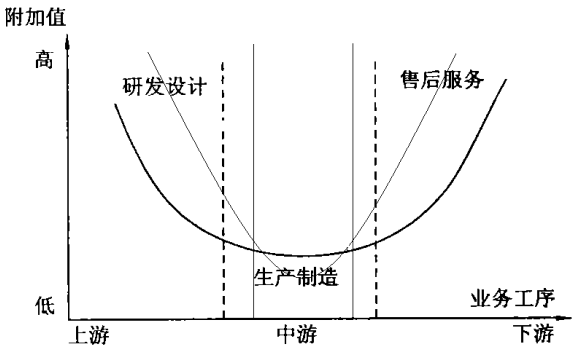


图 30 微笑曲线及动态变化

3. 低劳动力成本致使产业提高效率的动力不足。

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不能仅仅看绝对的劳动力成本, 应该是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二者的综合体现。也就是说, 比较了劳动生产率后的相对劳动力成本才更具有可比性。目前我国制造业绝对劳动力成本处于较低位置, 但考虑劳动生产率后的相对劳动力成本却并不低。根据联合国 2002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见表 6), 我国的工资水平只有美国的 2.1%, 日本的 3.35%, 韩国的 7.78%, 但是劳动生产率也只有它们的 2.7%、3.98%、6.15%, 经过计算之后, 我国的相对劳动力成本是美国的 76.9%、日本的 83.8%、韩国的 125%。虽然最近几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高于工资的增长速度,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相对劳动力成本下降; 但是总的来说并不能改变我国相对劳动力成本较高的状况。

我国的低劳动力成本, 允许劳动生产率低的经济活动也能赢利, 使很多低劳动生产率的经济环节缺乏提升效率的动机, 劳动力的低工资掩盖了低效率。一些效率相对较高的经济活动, 也缺乏进一步提升效率的动机, 因为依靠低工资也能

够寻求到足够高的利润。结果是很多企业不是想法设法提升效率，而是想法设法降低工人工资。

表 12 我国与世界各国劳动力成本比较

	工资率 (A)	劳动生产率 (B)	相对劳动力成本 (A/B×100)
美国	100. 0	100. 0	100. 0
日本	62. 6	67. 8	92. 3
韩国	27. 0	43. 9	61. 5
菲律宾	8. 6	15. 9	53. 8
印度尼西亚	4. 6	6. 6	69. 2
印度	3. 1	2. 9	107. 7
中国	2. 1	2. 7	76.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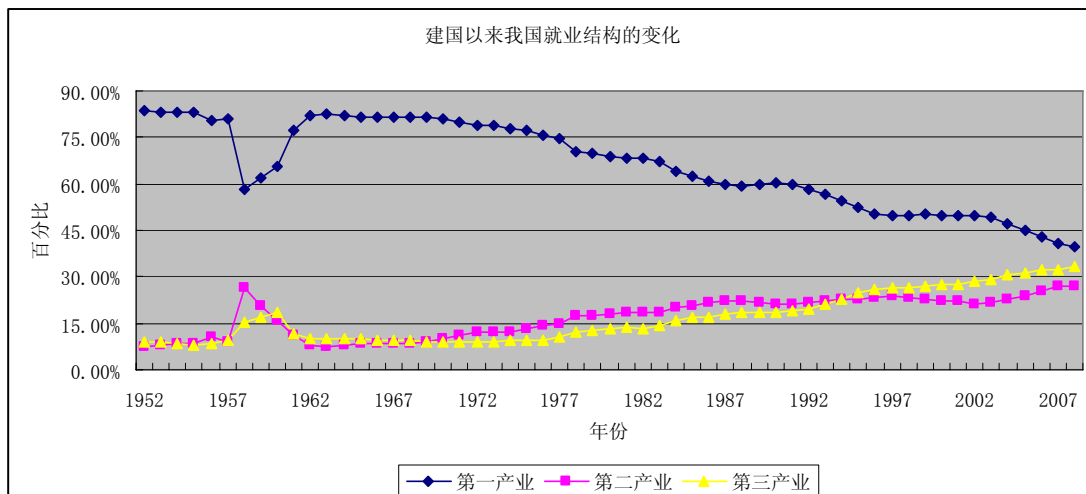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组织,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还有很多方面，由“农民工”为主的中国制造业工人队伍由于没有受过职业技术教育，也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产业集中度来说，因为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很低，就使得我国的制造业企业即使在没有规模经济效应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大的赢利空间，这样我国的制造企业就没有扩大企业规模、追求规模经济效应的内在动力，导致我国的制造产业集中度都很低。由于中国制造业工人的低工资，企业在不注重研发投入的情况下，也可以利用人工成本的极其低廉而走低价格营销的路线，同样获利，所以中国制造业 R&D 投入比例也往往不高。低的工资水平使得我国制造业企业可以拥有成本优势，但是由于带来其它危害，实际上我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并不强。

四、工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是从以轻工业为中心到以重化工业化为中心，再从以重化工业为中心转向以高加工度工业为中心，最后才转向以技术集约化工业为中心。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有助于工业化进程从重化工业化转向高加工度化，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也具有内在的可能性由行政力量主导转向市场力量主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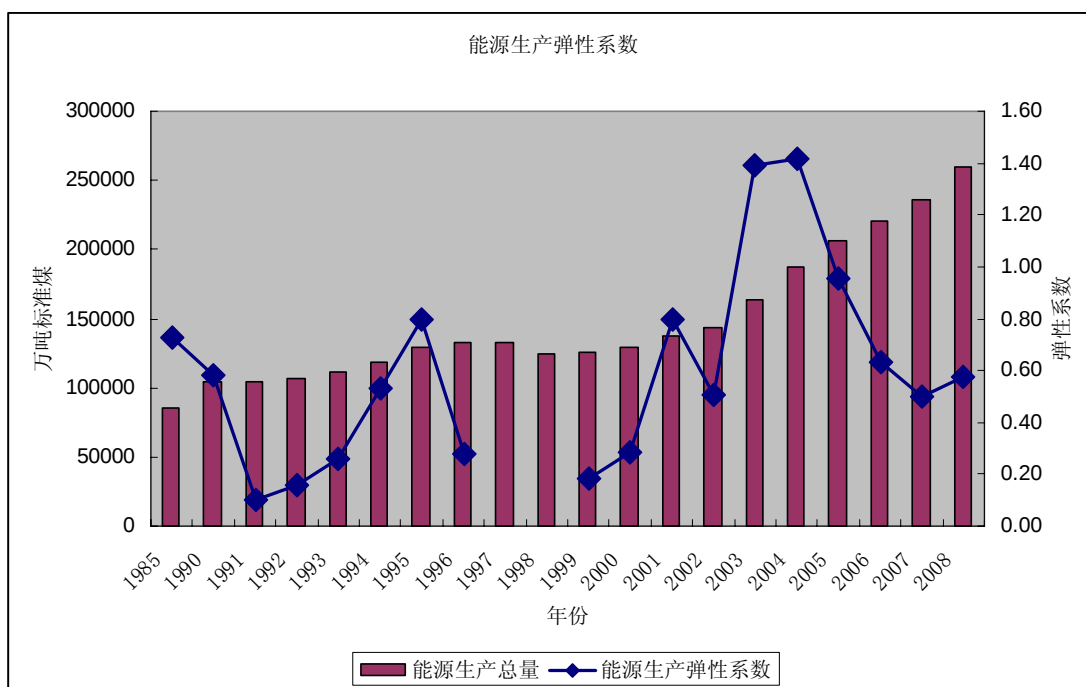
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困难在于，缺少市场导向型结构调整的内在驱动力量，即在二元经济结构下，要素价格市场化机制长期无法实现。经济发展过程就是通过生产结构调整和就业结构变化促使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自 1978 年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农业部门的就业比重逐年降低，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持续增加，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比重迅速提高。

图 31 1952—2008 年的就业结构变化



制造业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但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低端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上。产业结构升级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得到改善，反而产业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例如，从能源生产看，能源生产总量逐年增加。在 2003 和 2004 年能源生产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图 32 1985-2008 年我国能源生产变动情况



国家一直强调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可为什么就是调整不过来呢？根本原因在于要素价格市场化机制没有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应该由市场主导，发挥要素价格变动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中期偏后的阶段，大致相当于重化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修正的霍夫曼系数大约在 0.8 左右，越过了 1 这个转折点。我国现在的重化工业化程度与 1980 年的日本差不多，当时日本的重化工业化步入尾声。问题是，日

通过比较美国产业发展趋势，我们对中国未来产业发展进行了预测。中国经济在 1980 年代以前已经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覆盖轻纺工业、重化工业与制造业。基于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图 32 从经济发展动态视角描绘中国重点产业分布形态。如图 32 所示，在各重点产业等价的假设前提下，中国重点产业在轻纺工业、重化工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纬度上呈现非对称的倒 U 型分布，其轻纺工业、重化工业、制造业与服务业间的 2.0 : 3.5 : 2.5 : 1.5 重点产业数比例，与中国产业结构较为吻合。作为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经济黑洞的结构映射，未来相当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同时包括轻纺工业化、重化工业化与高加工度化的工业化过程。

图 1-1-1 中国三次产业分类图

第三产业									
纺织		轻工	有色金属	石化	船舶	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	物流	
			钢铁		汽车				
轻纺工业化		重化工业化		高加工度化					
工业						服务业			

40

表 13 中国产业发展预测

分布区域		动态性质
萎缩产业	农业、林业、渔业和狩猎业 11 耐用品制造业 33 非耐用品制造业 31 零售贸易业 44 运输和仓储业 48	$(E_Y^i < 1, \pi^i < 0)$
	采掘业 21 建筑业 23 政府外其他服务 81	$(E_Y^i < 1, \pi^i > 0)$
	教育服务业 61	$(E_Y^i > 1, \pi^i > 0)$
临界	住宿和饮食服务业 72	$(E_Y^i > 1, \pi^i > 0)$
成长产业	公用事业 22 金融和保险业 52 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 54 行政和废物管理服务业 56 保健和社会救助业 62 艺术、文娱和休闲业 71	$(E_Y^i > 1, \pi^i > 0)$
	S. H. 批发贸易业 42 信息业 51 房地产和租赁业 53 公司和企业管理业 55	$(E_Y^i > 1, \pi^i < 0)$

五、工资形成机制变革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增加了农民工进城的机会，将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与城市人均消费水平正相关。而目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仍然大幅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更多的农民工进城成为城市人口，将大幅提高整体居民消费水平。

2009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指出，我国 100 万人口以上城市已从 1949 年的 10 个，发展到 2008 年的 122 个。2008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区）GDP 占全国 62%。东部沿海地区密集的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城市居住条件大大改善，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已由 1949 年的 4.3 平方米，增加到 2008 年的 23 平方米。尽管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获得了快速发展，然而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推进城镇化建设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战略。工资形成机制变革有利于城镇化水平提高，增加居民收入将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水平。图 33 表明，城镇化水平与城市人均消费水平正相关。而目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仍然大幅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更多的农民工进城成为城市人口，将大幅提高整体居民消费水平。

图 34 城镇化率与城市人均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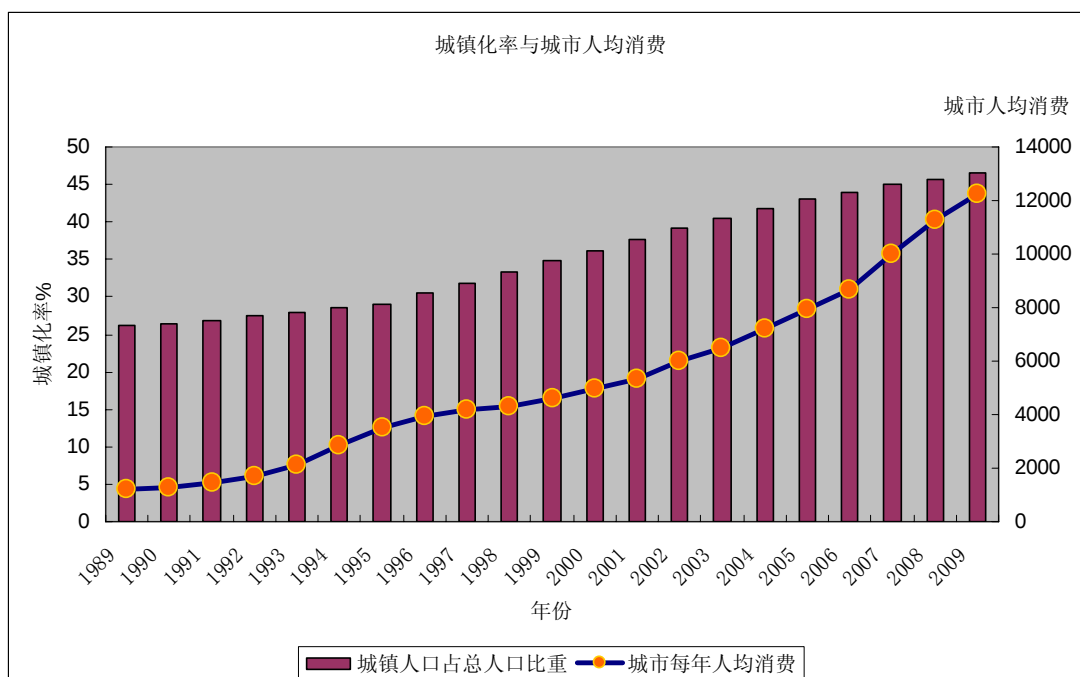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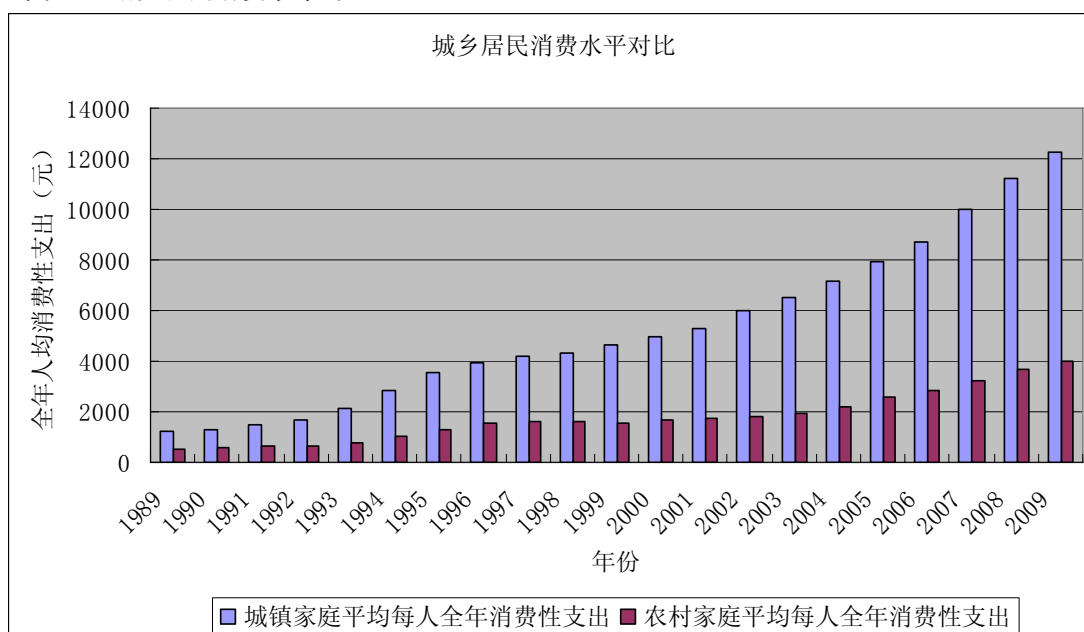


图 35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对比



第四部分 结论与政策建议

工资上涨是顺应工资形成机制变革的外在表现。保留工资变化、低端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工资的回补以及政府为应对宏观经济形势对工资形成机制干预增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工资形成机制发生变革。工资形成由传统的生存工资定价法则向市场议价型工资法则转变。

未来工资上涨的较快上涨必将给部分地区、部分产业以及整体宏观经济的稳定带来冲击。但是，在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效率持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以及中国贸易依存度偏高等条件下，未来持续加速的工资上涨不会影响我国制造业的总体竞争优势，也不会近期转化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利于改变目前存在的各种深层次结构性困境。中国低端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必将成为引领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支点，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新的契机，开启中国市场驱动型经济结构调整的新阶段：

（1）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从根本上改变劳资关系，改变工资上涨严重滞后于国民收入上涨的局面，使中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而启动中国市场化收入倍增变化，改变中国收入分配不公，提高国民的整体消费率，加速中国“收入-消费升级”的台阶效应的到来。

（2）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的上涨将对不同区域的生产成本带来不同的影响，从而使各种传统产业在区域成本差异的推动下，向中西部加速进行“梯度转移”，使东部流出产业升级的空间，同时克服以往行政化产业转移带来的各种问题。中国必将在迎来在“加速性梯度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的新时期。

（3）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各种要素价格之比，使市场主体自发进行要素替代，采取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促使企业提高自主研发和技术进步水平，积极探索新的盈利模式，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以往行政性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的弊端，开启市场化创新的新时期。

随着工资形成机制变革，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将引发资源配置发生变化，进而引发的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支点效应，推动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深化。结构调整的步伐将加快，工业化进程可能会藉此向高加工度化阶段推进。工资上涨会对部分产业和地区产生负面的冲

击。但从总体而言，工资上涨并不会影响我国制造业的大国地位，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地区转移。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将为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一个有力支点。借助工资形成机制变革的杠杆作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从根本上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促进消费驱动型社会的加速形成。加大产业结构梯度转移，促使产业结构调整从行政调整向市场调整转变。将进一步巩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为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奠定坚实基础。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将为我国推进城镇化带来新的助推力量。

因此，市场议价型工资上涨是我国要素市场发育的必然产物，是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的一个突出表征，它预示着未来的结构调整将从行政驱动型转向市场驱动型。工资形成机制变革标志着中国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第一，劳资关系将发生深刻变化，带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为中国迎来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拐点性转变提供了新契机，为缩小收入分配差异过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的加速转变。

第二，区域结构的变化，将带动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新格局的形成。

第三，要素价格比的变动将促使产业结构自动升级，中国将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提前启动制造业的高加工度化，进一步强化未来国际分工的大国地位。

第四，城镇化建设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动和工资水平的加速上涨将使中国迎来城市化的超加速期。

第五，工资增长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本政策的实施，将使中国步入人力资本投资的加速时期，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将使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人力资本偏向型发展期。

鉴于上述的判断，本报告认为，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低端劳动力市场供求拐点式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种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机制变革的战略意义，应当看到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不仅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开启中国全面市场型结构转型的支点。

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要求政府在两个方向提供政策支持。发挥政府行政调解的积极引导作用，补足过去政府政策缺位部分，让政府的力量弥补市场的不足，让市场力量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克服转变过程中政府形成的制度障碍，改革政府的不当干预，消除政府调节的负面作用。

第一，要从战略发展的高度，把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与要素价格市场化作为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通过价格机制的杠杆作用撬动整个经济结构的重塑。从而将以往单纯的行政转型思路转变到以市场导向的经济结构转变上来，使市场主体自发地、全面地、稳定地进行分配机制的调整、产业的升级、区位的选择和创新的强化。

第二，要积极推动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引导和规范低端劳动力市场“市场协议”工资形成机制的培育。政府要顺应工资形成机制变革趋势，积极推进工资形成机制变革的制度建设。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切实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和进行深入细致的工资条例改革。同时，逐步完善工会制度，加强劳资纠纷的立法，重视农民工的培训。同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以应对工资水平的上涨带来的负面冲击。

第三，尽管市场力量成为未来结构调整的基本驱动力，但劳动剩余与工资上涨的并存格局决定了结构调整还要辅之以政府的适度干预，防止单一的市场机制将中国经济过早地引入到偏废就业的新古典轨道。政府干预主要体现在中观层面的产业干预和微观层面对企业技术选择行为的间接引导上。例如，在农民工工资水平大幅度上涨和农民工工资市场议价机制形成之后，政府应当引导该机制变革对于中高端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积极培育市场化工资形成机制，有意向地调整传统的劳资关系，加强初次分配改革中的各项制度建设。

第四，加大改革力度，完善要素市场，让要素价格更多地反映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通过理顺要素比价关系，重新校正各种技术进步模式的成本收益。中国的金融压抑导致资本价格长期定价过低，工资上涨的必然结果就是劳动要素相对价格的提升。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让要素价格灵敏地反应要素供求关系的变化，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问题。一开始，工资上涨迫使企业采纳资本密集型技术，对资本需求量随之增加，如果利率形成机制足够灵活，利率也应随之上调，这样劳动的相对价格又会下降，企业采纳劳动密集型技术的动力就会回复。二是运用政策杠杆来矫正各类技术创新的收益比较，通过利益诱导机制来间接引导企业的技术行为。这就要求研发补贴、费用抵免、加速折旧、关税减免等传统的技术鼓励政策不能再执行一刀切的做法，而要根据要素偏向度执行有区别的优惠政策，并给予劳动偏向型技术更大幅度的倾斜。

第五，在产业加速梯度转移的进程中，政府一方面要顺应市场化转移的潮流，加强中西产业转移承接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必须出台政策应对东部

在传统产业转出后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必须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使东部进行全面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以形成东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产业基础。为此，就必须进一步打破地方保护和垄断，形成新的区域分工与协作，迎接产业发展的梯度转移。要根据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确定各异的主导产业，形成多层次主导产业格局，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主导产业序列中留下足够空间。对东部地区来说，随着本地剩余劳动力的枯竭，资本充裕、劳动稀缺的禀赋特征将愈发明显，这些地区可以更倾向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西部地区聚集了大部分剩余劳动力，劳动剩余、资本稀缺的禀赋特征还很明显，在选择主导产业时，应该更倾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主导产业差异，既迎合了东部地区战略型产业优先发展的需要，又在国家层面避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早退出。

第六，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成本，为加快城镇化进程创造条件。要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配合土地制度和财政体制联动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两者不仅都有其自身重大价值，配合起来还可以相得益彰。比如，通过允许城郊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就可以降低城市的地价和房价，解决流动人口中较高收入群体购买产权房的问题；而在城中村改造中通过借鉴“区段征收”、“市地重划”，并创造性地通过规划限制来将其中一些地段改造成具有良好生活环境的出租房集中区，将有助于为外来流动人口较低收入群体解决住房问题。

第七，加快优化出口结构，扭转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充分利用境外经贸合作区等方式促进贸易增长；继续深化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合作。中国出口应尽快由过去主要靠低成本优势逐步向依靠技术创新、进步和经营管理方式改善的优势转变。为了应对国际竞争的挑战，需要探索新的竞争方式和思路，诸如提高生产率、更多生产高质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培育更多在质量和产品附加值方面拥有国际美誉度的企业，从成本优势逐渐向质量和品牌等转变。

第八、在劳动力结构和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期，人力资本战略和人才战略的实施具有高度的经济战略意义。府应当从传统的物资资本投资模式转向人力资本投资模式之上。中国不是面临人口红利终结的问题，而是面临如何将人口红利转换成真实的发展动力的问题。其关键是人力资本能否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要求。提高劳动者素质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但这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是很难完成的，特别是在现有的制度约束下，农民工带有明显的“钟摆式”迁移的特征，流动性很大，如果仅靠企业来搞培训很难将培训收益内部化，培训供给肯定不足。

如何结合政府和企业双方力量来改善培训效果，是中国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德国和日本在工业化转型时期都启动了强制的国民培训计划，政府动用财力进行补贴、企业提供培训服务。政府补贴不干扰企业在培训上的微观运作。通过这些强大的培训体系，德国在一战前将数以百万的无业流民培训成合格的产业工人，输送到以军事工业为代表的重化工业部门，为这些部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人力基础。我国也可以结合这些经验探索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政

第九，降低民营资本的“进入壁垒”，让民营企业在未来的结构调整中扮演更重要的作用。工资上涨对民营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冲击更大一些，它所引起的结构调整压力也主要发生在这些体制外的部门，它们将成为结构调整的主战场，而对于那些国有资本及行政力量主导的体制内部门特别是垄断型部门来说，它们感受的调整压力要小很多。由于主导体制外部门资源配置的基本力量是市场力量，所以以体制外部门为主战场的结构调整也将以市场力量为最基本的驱动力，行政力量将退居次位。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要注重发挥民间资本优势。政府应拓宽民间投资渠道，为民间投资提供金融支持。